

世貿會議成為抗議戰場



世貿社會條款與社會反抗

大批請願人士在西雅圖市中心區遊行抗議

林巧英冤獄的啓示 反對橫徵雜稅！

與權錢結合的中國貪污腐敗 英國向右傾

美國總統選舉 伊朗學生要求政治民主化

分離主義運動動搖印尼 婦女領袖訪問記

巴西南里州的重要政治勢力——工人黨

世貿協議為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鋪路

反對橫徵雜稅，劫貧濟富！

振言

特區政府高官不斷強調兩年來出現財政赤字，認為加稅加費已無可避免，不久前提出要求增加3千多項收費被立法會否決後，近來不但聲稱要再次提出，而且要開徵消費稅和陸路離境稅。這些主張，我們堅決反對，而且號召全港市民，尤其是低下階層市民要堅決反對到底！

當局的許多收費（如水費、排污費等），都與每一市民息息相關，再增加只會更加重他們的經濟負擔。尤其是當局積極計劃中的銷售稅，更是低下層市民都必須生活消費而無一例外地被加重負擔的枷鎖，是當局要從他們幾近「乾涸」的口袋中再壓榨走一部份！

香港普羅大眾已長期被港英政府的「三高」（高地價、高租值、高收費）政策所壓榨，被置於貧富日益懸殊的一端；回歸後，生活指數高企的情況未見有改善，反而連續兩年高居全球城市最高的第三位（據1月20日《蘋果日報》報道英國《經濟學人》的調查結果）。而與此相反的是，全港低下層市民的收入又不斷下降；勞動者的權益得不到應有保障，當局容許其機構、尤其是資方利用勞工法例或「法律罅」盡力剝削工人（例如「三鐵」、馬會、快餐店等大機構長期聘用「兼職」「臨時工」，那些工人的時薪只有十多元，且無福利待遇。）許多家庭領取的綜援金額，又被社福署普遍削減。港府一些機構推行外判制、私營化、精簡化，造成越來越多的員工失業，擴大失業隊伍；同時又大幅降低新聘公務員的薪酬待遇，與私營企業爭相壓低員工薪酬，你追我趕……。高官們一方面搶先宣揚香港經濟已大大回升，另方面仍在計劃繼續凍結在職中下層公務員的薪金，希圖先向每年獲利甚豐的匯豐銀行看齊，然後進一步降低他們的薪酬待遇。

在這樣從各方面造成廣大市民近乎「民不聊生」的情況下，港府還要開徵銷售稅和大增水費、排污費等；而陸路離境稅也是在一國之內倡導地區之間收「買路錢」，加重經常來往的人的負擔。這些都是向廣大市民「落井下石」，使他們苦上加苦。這樣的「德政仁政」，比之港英殖民政府的統治還要走得更遠！

銷售稅還將使市民減少消費，大大影響零售、飲

食和旅遊各業的「生意」。

港府每次提出新年度的財政預算，總是玩弄數字玩笑，先盡量誇大開支、減低收入數字，以製造龐大赤字，為它的增稅加費作辯護。但只在亞洲金融危機、香港經濟衰退的這兩年間，才出現財政赤字。而港府雖有長期來累積著的天文數字般財政儲備，卻不願撥出一部份來幫助香港「共度時艱」，減消該年度的財政赤字，為的是維持他們的加稅藉口。

另一方面，它對大工商業者、有錢人們，卻非常優待、照顧，不肯向他們增加稅收；年獲利收入數以億元計的大企業或個人，與年獲利收入幾萬元或較多些的小企業或個人，都同樣照標準稅率計利得稅。這些事實，又一次表明官商的勾結、互助互利，這個政府是官僚富人的專政，而絕不是全體港人的民主治港！

本來，要增加港府收入，避免財政出現赤字，就應該從獲利豐、高收入者和港府高官等方面著手，主要的是應該向前者徵收累進稅，同時要對高官減低其過高的薪酬待遇，責成許多部門及高官改正和避免由於出錯或嚴重疏忽等所造成的資源財富巨大浪費。

（例如，由審計署或公眾人士所已指出的，對購入東江水過多損失17億元、長久空置大量港府物業、多次廉價批地引致達10億元損失、排污設計錯誤造成維港污染、高官非必要的公費開支或津貼……諸如此類。）

如果這樣地向上述各方面著手，對港府財政將會有大量的收入，有效地解決赤字問題，而不必開徵銷售稅，免致增加低下層市民的生活重擔。但港府一直不肯這樣做，而只是向弱勢社群和低下層人民打主意。

正由於銷售稅建議太「犯眾憎」，以致立法會內絕大多數議員都加以反對。但高官們不會由此罷休，他們鑒於有「保皇黨」議員的忠實支持，最後仍會得到他們轉舵，改投支持票（有如以前多次的表現那樣），因此，這些新稅、加費動議還會繼續提出，港人還應堅持反對，警惕今天初步表示反對的幾個政黨的轉舵，全力阻止銷售稅等劫貧濟富動議的實施！

2000年2月16日

林巧英冤獄的啓示

微波

林巧英經港返美被指控持用假證因而判入獄四個月，經上訴驗明護照無假而「得直」獲釋。這宗冤獄使人得到的啓示是：

第一、它顯露了香港法律制度及其人員執法方面的重大缺點。他們懷疑證件屬假造，卻不經過必要的查驗，便提出控訴；司法人員也不根據驗證，而只根據被告的「認罪」，便判以有罪。但實際上，雖然沒有古今中外警察國家常見的「嚴刑逼供」那樣的嚴重事例在今日的香港出現，但許多執法人員爲求簡便「交差」結案而使用威迫及誘導手法使當事人認罪的情況，卻是很可能發生的。爲預防這種冤案發生，用科學方法鑑證有關證件，便成了必要的程序。但入境處人員在這宗冤案被揭發後向立法會一個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上仍然堅持不需這種程序，說「根據現行入境條例，只要涉用假證者認罪，加上強烈的環境證據支持，入境處毋須進一步化驗問題證件，便能提出檢控。」（2月11日《成報》）一個未成年的16歲少女，隻身處於完全陌生的環境，沒有親人和律師的幫助，反而會在對方（包括傳譯員）的重大壓力下，以爲聽從人言便可早日返家，於是「認罪」了。這種情況之容易發生，是不足爲奇的；而現行條例則提供了執法人員以這樣的「方便」。

第二，它反映了香港執法人員對內地人民的特別歧視心態。正如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胡紅玉所說的，林巧英冤獄只是歧視問題的「冰山一角中的一小角」。她對記者表示，她曾接觸過「不少內地經港人士受到香港紀律部隊冤屈的申訴」，歧視包括對不同國籍及不同地點來源的不平等對待，而對內地來港新移民的歧視，更是歧視中一大項目。她「直指居港權增大港人對內地人的排斥心理，其後接二連三發生新移民學童跳樓自殺及林巧英事件，令人痛心。」（2月11日《蘋果日報》）這種歧視內地人的意識，由於1年前港府官員高度誇稱將會有167萬內地子女在10多年間湧來香港，使香港財政無法負擔、影響資源分配、分薄港人福利等宣傳而更加強化，由此分化了居民，挑起民衆鬥民衆。歧視意識發展到這樣的程度，

以致這宗冤獄雖然已經「上訴得直」，但2月2日的《星島日報》在報道此事時，還在頭版大字標題認爲：「林巧英『含冤』疑點重重」，並詳列7點「疑點」，彷彿要質疑上訴結果的正確性；次日的港台「報章摘要」也特別報道《星島日報》這些「疑點」，以廣宣揚。而經過一電台的時事評論員指責這種「疑點」報道之後，2月11日的《東方日報》又以「林巧英案揭假證世家疑雲」爲大標題，報道與她的兄姊同名的證件曾「多次被用作偷渡赴美」，從而至少是在客觀上「抹黑」她，影射她是涉嫌「假證世家」的成員。這些是不是歧視意識的反映，或者是想迎合那些歧視內地人的讀者的「市場需要」呢？

香港社會上歧視內地人的情況普遍而嚴重，從不久前林捷的悲慘結局也可反映出來。她從內地移民來港，學業成績優異，曾連奪全港中學組、新移民徵文比賽冠軍，卻受不了社會上的無形壓力，同學們的歧視排斥，學校的「讀不完的書、做不完的作業、考不完的試」……，終於寫下了「這5年來我憎恨香港，討厭香港這個地方」的遺書，以跳樓自殺向充滿歧視的香港社會作出「死的控訴」。這種極端消極的錯誤行動，與她在得獎文章中的「我定會再接再厲，發奮圖強，迎接新的挑戰」的諾言相反，是不能爲別的人效法的！但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各種不合理制度和事物，應對林捷之死負上完全的罪責！〔編者按：上述的林捷得獎其中一文，請參看本期的轉載。〕

在林巧英冤獄曝光後，高官都表示重視這事，要加以調查，把結果向當事人和社會公佈。在無法掩飾錯誤之下，官方有可能只輕描淡寫地把責任推在個別人員身上，而盡可能維持當局的權威、司法及條例上的「公正」形象。但事實上，有關的錯誤，並不是個別人偶然疏忽犯下的「特殊個案」，而是相當多的現象、有關制度及條例上的「漏洞」和社會上歧視的問題。如果不正本清源地改正，則更多的林巧英、林捷之類的事件將會繼續發生、無法避免。

2000年2月10日

(轉載)

我在香港的日子

林婕

〔編者按：以下轉載的，是一位年紀很輕的女學生奪得全港新移民徵文比賽冠軍的文章。她由於受不了「外來的壓力、心靈上的創傷」、「無處不在」的「絆腳石」……，結果以一念之差跳樓自殺，向這個社會作出了「死的控訴」！我們在非常惋惜之餘，特轉刊出她的得獎文章，冀盼別的人能從中汲取教訓、警惕！〕

薄薄的一封信，改變了我的一生。

這是一封來自移民局的信，牛皮信封裡，只有一張巴掌大的紙條，但卻是沉甸甸的。的確，我可以去香港定居了！看完那幾行模糊不清的小字，我怔住了！香港，我曾經夢寐以求的地方，可是如今，我已不再嚮往——我怎麼捨得養育了我十來年的故鄉？怎麼捨得朝夕相處了數年的摯友？抬起頭，看見父母臉上綻放的笑容，我強忍住淚水，擠出了並非發自內心的一句話：「太好了！我終於可以去香港了！」

無情的銀鷹，硬是將我從故土溫柔的懷抱中載上灰濛濛的天空。望著窗外褪色的山崗，撕碎了的雲朵，我黯然淚下。爸、媽，你們可知道，我當時多想燒毀那可惡的單程證啊！可是我並沒有那麼做，因為我明白，你們決定移居香港，是爲了我的前途。

初到香港，我們住進了破損不堪的臨屋區。三張無奈的面孔，鑲著生硬的微笑。我還以為香港這一繁榮的城市，應該是處處高樓屹立，可沒想到，天堂的一角，也有如此的地方。狹窄的鐵皮屋子，站兩個人已嫌擠迫；流浪貓狗隨處可見，又髒又臭，令人惡心；還有體大如貓，數頻若人的老鼠危害人家，散播病疫！這是人住的地方嗎？想想我的老家，寬敞舒適的房屋，整齊潔淨的家具……真是天差地遠啊！

陌生的語言，陌生的臉孔，陌生的街頭——一切要從零開始。所帶來的錢熬不了多久，況且在港的親戚也不富裕，無法給予我們經濟上的幫助，於是爸爸媽媽四處奔波，一面忙著找工作，一面爲我找學校。他們可真辛苦啊！

忍受降級三年恥辱

我的英文水平差，爲了打好基礎，我決定降級三年，從小學讀起。然而好的學校不肯收我，只好被派往一所鄉村小學。

天哪！我在內地就讀的可是省級重點中學，而如今卻被貶到了僅有五六十個學生的鄉村小學。那時的我真無法接受！曾經繁華的校園，變成了凹凸不平的村路；曾經宏偉的教學樓，變成了幾堵簡陋的牆壁；曾經幽雅寧靜的環境，變成了蚊蟲的集聚點……你讓我如何去接受？哭啊，鬧啊，就是不願面對現實。

媽媽寬慰我說：「不讀這所小學，你只能去最差的中學。乖，你現在吃點兒苦，這兩年拚一拚，考上好的中學，就輕鬆多了！」是啊，媽說得對！後來父母幫我請了補習老師，希望我能盡快趕上當地的英文課程。我依然清晰的記得，我做的第一份習作，是小學二年級的！當時的心情確難形容，這簡直是種恥辱！

而爸爸媽媽受的委屈也不少啊！新移民難找工作，我的父母也不例外。語言的障礙、種種的歧視阻撓著他們。爸爸的身體向來不好，十分需要靜心休養；媽媽的活兒，是酒樓的侍應，一整天下來，除了走，就是站，使她的腰疼病又復發了。可是爲了我，爲了這個家，他們別無選擇的，只能咬緊牙關撐下去。爸爸媽媽每天起早摸黑，而所賺來的錢，只能勉強應付日常生活上的開支。至於添置家具、電器、衣鞋，都是些如夢般的空想。於是爸爸下班回家，總會不時到附近的屋村兜一圈，看看有沒有什麼適用的東西，然後用其極靈巧的雙手，修修補補，拆卸裝置。漸漸地，電冰箱、洗衣機、床、衣櫃、書檯填滿了屋子——誰會想到這些竟是被人遺棄的破爛啊！

來自內地是罪過嗎？

初來港的第一年是最難熬的，我幾乎每晚以淚洗面。同學們都看不起我，愛以「大陸妹」稱呼我；他們知道我不懂粵語，就常以此來捉弄我；後來他們知道我的年齡比同級的學生稍長，又以此爲話柄，取笑我「老」……同學的白眼、冷嘲熱諷，就像一把把鋒利的刺刀，戳向我的心窩。我很費解，我到底做錯了什麼？難道「我來自內地」就是我的罪過嗎？這些外來的壓力、心靈上的創傷，我都不曾告訴過父母，因爲他們的擔子已經夠沉重的了，我不希望他們再爲我操心。

每當看到父母日益消瘦的身軀，逐漸憔悴的面

與權錢結合的貪污腐敗

張開

貪污腐敗是官僚制度的產物，是中國社會從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起無法醫治的痼疾。儘管在這長期間，中共高層作出過許多次反貪污腐敗的決定，但無大效；反而跟隨著唯利是圖的市場經濟的全面恢復，權力與金錢利慾相結合，使貪污腐敗情況更日趨嚴重化、普遍化。這種發展，在中共今年1月中旬召開的一次會議公報和領導人的講話中得到證實。

新的反貪污腐敗的決定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指出：今年是實現十五大確定的反腐敗目標的關鍵一年，要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大案要案，堅持重點查黨政領導機關、行政執法機關、司法機關、經濟管理部門和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的違紀違法案件，加大對各經濟領域及司法、幹部人事工作中違紀違法案件的查處力度，注意查辦走私騙稅、國企領導人員、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及農村基層幹部的案件；加大監督檢查和責任追究的力量，其重點是：本地區、部門出現重大經濟損失的；發生重大事件和惡性事故的；不正之風嚴重、群眾反映強烈、長期得不到治理的；領導幹部配偶、子女利用該領導幹部的職權和影響獲取非法利益、造成惡劣影響的。

上述的規定表面看來似乎是空泛無物的，實際上卻是針對已經發生在範圍廣泛、涵蓋黨政上下各方面的貪污瀆職，它列出許多「不准」做的事，實際上正是在做著的。

紀檢會書記尉健行在會上除了重複上引公報的內容後，還具體報告了99年的工作概況，從而顯示了上面引述的各種查處和「不准」，絲毫不是「無的放矢」，不只是表示一般的原則。他舉出：99年，各級執紀執法機關揭露和查處了一批職級高、金額大、人數多、作案手段隱蔽、案情錯綜複雜、影響相當惡劣的重大案件。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已查結案件十三萬多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十三萬二千多人，縣（處）級幹部四千多人，地（廳）級幹部三百多人，省（部）級幹部十七人。

上舉的數字顯示，被處分的縣（處）級及以上的幹部合共約佔3%多些，而且越到上級（省、部級）人數越少；其餘近97%都是下級的幹部、黨員。這又一次顯示，同過去一樣，中共幾乎全拍「蒼蠅」、不願打「老虎」。

新的貪污大案驚人

以下，讓筆者試舉一些已見於中、港報章的部份事例，以便更具體地指明中紀檢委會作出有關決定的背景，和他們所不願特別提起的「官場大醜聞」：

（接上頁）

容，就會激起我克服困難、勇往直前的決心。內地好友們，不斷來信勉勵我、啟發我，使我上進，我的決心也更堅定了。對，我絕不比香港的學生遜色！在老師不倦的輔導和自己不懈的努力下，我的成績有顯著的提升。後來的幾次考試，我總是全班第一。至於英文，就再也不是我的弱點了！站在高高的領獎台上，我為父母感到欣慰，也為自己感到自豪。

日子逐漸好起來了。九六年初，我們搬進了公共

屋村，雖然生活仍很拮据，但一家人和和睦睦，過得很是愉快。同年夏天，我亦考進了一所一級中學，父母笑得更燦爛了。可不是，他們的心血終沒白費。望見父母的笑臉，我的心裡甜絲絲的，慶幸自己所付出的，得到了回報。

現今回想起來，明白到人的一生，若沒有小風小浪，就猶如一杯白開水——平淡無味。曾經的酸澀，換來如今的甘甜，我覺得是值得的！要走的路還很長，絆腳石無處不在，我定會再接再厲，發奮圖強，迎接新的挑戰，開創美好光明的未來！

一、中央財政部會同監察部、審計署、中國央行，於99年1季度對中央單位預算外資金管理情況進行檢查結果顯出：「一些」中央單位的有關「管理現狀堪憂，四方面問題頗為嚴重」。據初步統計，共查出違規收取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基金7.35億元（人民幣，以下同），應繳未繳中央財政專戶資金124.6億元，應繳未繳財政預算資金63.3億元。檢查出的主要問題有：1.多頭開設賬戶，違反有關規定；2.擅自立項違規審批收費，逃脫中央財政監督，它們發下去的紅頭文件本身就是違法的東西；3.截留和隱瞞應繳財政預算和財政專戶資金；4.濫支挪用預算內外資金。其中「個別部門和單位用於對外投資和放貸」。（1）

二、中國全國審計工作會議透露，99年審計部門對扶貧基金等方面的資金運行情況進行了審查，共查出各類違反財經法規金額達1,250億元。其中，擠佔挪用財政扶貧資金用於彌補行政經費、建房和買車等43億元，轉移挪用水利建設資金和亂集資等違法違紀金額30億元；全國縣級以上2400多個法院和2100多個檢察院97至98年度合共有亂收費罰款、隱瞞轉移收入和擠佔挪用等違法違紀金額57億元，涉嫌貪污和私分挪用公款案件81宗，涉案人員103人；查出62所高校98年度亂收費、違規從事金融業務和挪用專項資金等49億元，涉嫌經濟犯罪案件8起；擠佔挪用三峽移民資金等5億元，發現貪污私分該項資金案件10宗，涉案人員14人。（2）而據1月22日《成報》轉載法新社北京1月21日電，則引述官報說官員侵吞了這項安置三峽移民資金是50億元。

上引電訊報道的違規等金額共只佔總數的一小部份，其餘絕大部份卻沒有透露，顯示內情更耐人尋味。而所透露的有關各方面，其行為的可恥（執法犯法，且連扶貧、三峽移民、水利等有限的專款也「挪用」侵吞），已夠使人憤慨！

三、公安部副部長趙永吉表示：中國的經濟犯罪呈現「發案數量猛增、涉案金額巨大」的趨勢。99年前8個月，公安立案偵查的經濟案件涉案金額達840多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倍；案件3萬3千多宗，比上年同期增加23%。98年下半年，查獲走私物品近37億元；98年底，在打擊騙匯犯罪中，使國家避免了100多億美元的外匯流失。（3）

四、中共廣東省紀檢會和省委組織部通報：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是解放以來〔廣東〕走私數額最大、

涉及黨政機關、執法部門人員最多的一起嚴重經濟犯罪案件。96年初至98年9月走私總貨值110億元，偷逃國家稅收62億元，涉案人員331人，其中公職人員259人（包括原中共湛江市委書記陳同慶、副市長楊衢青、原湛江市公安邊防分局局長鄧野、政委陳恩，原湛江市和茂名縣的海關關長等人。）（4）

五、福建省政府新聞辦官員楊文普公開表示，中央紀檢會調查廈門遠華走私案已幾個月，大量的涉案官員被審查。這是50年來最大的走私案，遠華公司10年來利用軍、政、警、海關組成的關係網進行公開的走私活動，涉及幾十名中共、政法、銀行界高官，包括廈門市副書記劉豐、副市長藍甫、北京市委負責人的前妻。它走私的原油，約佔中國走私原油的7成多。（5）據《亞洲華爾街日報》報道，牽涉此案的官員愈來愈多，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的妻子（按：有報道是前妻）林幼芳也涉案被扣。初步估計，這個走私集團走私入口了總值達8百億元的石油、汽車等物品。（6）

六、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地下煙廠已從福建、兩廣擴散到鄂豫湘冀川黔及雲南。它們利用軍隊空置營房開廠，還打著「軍事重地」的牌子掩人耳目。偽裝和利用特種車輛（軍車、郵政車）運輸，走私煙、假煙已擠佔相當大的市場份額，據最保守的估計，國庫至少因此每年損失2百億元。（7）

七、《北京日報》報道：福建省郵電局副局長張毛東（音譯）和福清市海關關長鄭平（音譯），被控走私3億美元的手提電話等逃稅共4千萬美元，福建郵電局現正接受調查。（8）

八、關於公安部門存在的貪污腐化、違法亂紀情況，公安部長賈春旺向人大常委會去年12月下旬的會議作的報告部份地承認：

「近年來，公安隊伍中濫用職權，以權謀私比較嚴重，有些民警甚至為謀取私利，參與或變相參與經營歌舞廳等公共娛樂場所，參與走私、護私和販毒活動。在執法辦案和公安行政管理過程中，尤其是緝私、緝毒、車輛管理、出入境管理、特種行業管理等部門執法不嚴、執法不公甚至執法犯法等問題屢禁不止，一些公安機關超期羈押犯罪嫌疑人，非法插手經濟糾紛，甚至非法扣押、拘禁人質，利用執法權力替人追款討債，審訊時重口供、輕證據，把刑訊逼供作為辦案捷徑，結果致人傷亡。」

九、至於全國工商企業領域的貪污情況，可從

「國際透明度」組織的調查報告中看到。這個民間團體致力於全球反貪污腐敗的工作，對全球19個主要貿易出口國（和地區）的企業行賄情形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中國大陸是全球最差的。（9）

以上只是近年來有關中國黨政法軍警各部門、中央及地方、企業等的幹部貪污大案、要案的部份資料。它們連同其他無數的貪污事實（其中包括許多仍然受到有權勢高官庇護而掩蓋著的大案要案），構成了本文開頭引述的公報所宣稱要查處的真實內容，一證明公報所說的並不是「無的放矢」、憑空議論。

中共高層的對策

作為中共的高層領導人和政府部門的首腦，朱鎔基在國務院第2次廉政工作會議上也說：

〔現在〕「還存在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有些地方和部門領導幹部廉潔從政的各項規定還沒有得到很好落實，奢侈浪費現象比較嚴重；有的行政執法機關和人員有法不依、執法不公的問題仍然存在；群眾反映強烈的有些不正之風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性治理；有些領導幹部弄虛作假，虛報浮誇；有的基層幹部作風粗暴，甚至橫行鄉里。這說明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任務還相當艱巨。」

江澤民，在紀檢會上則提出：「治國必先從嚴治黨」。「黨內存在的一些消極腐敗現象所以屢禁不止，有的情況還相當嚴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相當一些地方和單位的黨組織和領導者治黨不嚴，對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疏於教育」、管理、監督。他和朱鎔基、賈春旺都沿用一貫的輕描淡寫公式，照例把實際上眾多的普遍的情況只說是「一些」、「有些」、「有的」；而作為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他，比之地方和單位的黨領導人更應對「治黨不嚴」負有更大的責任，而不應把「治黨不嚴」的責任幾乎全推在「一些地方和單位的黨組織和領導者」身上。

像這樣的不肯如實地承認貪污腐化、違法亂紀的普遍化、嚴重化的事實，不肯指出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由於各級幹部享有政經特權，從而共同維護這個特權官僚制度，不容許人民批評、監督和有權選舉、罷免各級官員，致使官僚幹部高高地騎在人民頭上，擁有特權可以任意胡為。最高領導人這種表示並不能「對症下藥」，從消除根本原因著手。這樣的對策正是中共中央長期以來的反貪污腐敗、反違法亂紀等決議、指示都成了不能落實執行的「官樣文章」、

「黨八股」的原因。這次的紀檢會決定和高層領導人講話（包括江澤民要「從四方面管好領導幹部」、「高級高員要管好配偶和子女」、建立用人失察責任追究制度，等等），在整個官僚制度維持不變的現狀下，都將會像過去許多次的整風、反貪運動那樣「走過場」，虎頭蛇尾地結束，逐漸歸於平靜；最多是在「嚴打」命令之時，拿多些下中級幹部開刀「示眾」，警誡其餘的人，使貪污受賄等行為稍為收斂些；但等到風頭火勢過後，又會「故態復萌」。這樣的「惡性循環」，是建國以來屢次出現的「歷史經驗」！

特別是在中國逐步走向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時候，資本主義的金錢利潤掛帥特性，誘使無數人更加利慾薰心，追求個人發財致富，尤其是手握權力的幹部，更容易走上這條路。中共中央雖然看到這種發展情況，不願貪污腐敗日益侵蝕社會的肌體，以致更加激起人民的怨憤、反對，加深它的「三信危機」，惡化下去會「亡黨」（陳雲多年前的警告），因而在多次反貪無大效之餘，不久前又決定連續3年給全國公務員每年加薪3成。但這些增加數字，對於許多有辦法又有意貪污的幹部，難以構成大的吸引力，因而並非根本有效的。

97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確定反貪污腐敗的目標，號召全黨黨員幹部和全國人民落實執行；但經過1年多之後，據上引公安部副部長趙永吉所說的，99年前8個月的經濟犯罪案件金額反比98年前8個月激增了3倍，案件增加了2成多。這對於中共十五大的決定和號召是一個難堪的回應，也再次表明黨官的決定和通令是無大效的、不能遏止貪污腐敗像癌細胞般擴散的。

2000年2月18日

註釋：

- （1）99年6月13日香港《文匯報》刊該報記者北京12日電。
- （2）今年1月22日《星島日報》專訊。
- （3）99年11月11日《明報》專訊。
- （4）99年9月16日《文匯報》。
- （5）1月23日《明報》。
- （6）1月21日《蘋果日報》。
- （7）1月11日《東方日報》。
- （8）（9）1月22日《成報》。

舊愛加新歡

麥尼爾

為安排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在1999年11月達成的協定，令此處的主流報章議論紛紛，大談這次交易將帶來民主的收益。《遠東經濟評論》稱這項協議為「世紀交易」，謂這將「對貿易帶來好處的同時，亦為人權和法治帶來好處」。克林頓的安全顧問珊地·伯格聲稱，該項協議安排將令中國成為「更開放，及更富多元性的地方」。不過，從中國處理王有才案件中可見，中國向民主的過渡仍然是遙遙無期。

王氏是中國小政黨民主黨的4個發起成員之一，他們由於企圖註冊成為合法政黨而被捕，判刑5至11年不等。王有才在去年聖誕節前夕上訴，但被駁回。

事實上，種種跡象顯示，國家的壓制行動在有增無已。眾多的民主活動人士備受滋擾和逮捕，地下宗教活動和崇拜活動被掃蕩，因搶劫或被判以叛國罪名而被處決的數量持續增加。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由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所帶來的社會後遺症，只有用打砸壓的途徑，才能夠加以克服。

鄧小平在1970年代末打垮了毛派一翼之後，中國統治階層中的多數一直致力於扭轉毛澤東治下佔主導的經濟政策。就如前蘇聯的狀況一樣，經濟政策之改弦換轍基本上是著力在出售國營企業和集體農場，向各國的貿易大開門戶。不過，中國領導人是在小心翼翼之下推行改革的步伐，不似前蘇聯的斯大林派那樣，在1989年戲劇性地垮台。此所以中國與世界大國進行磋商，希望融入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一部份。世貿的交易只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最為成功的階段而已。這同時也意味到，中國正在持續建立對外的軍事力量，和用以操縱人民的對內的保安機器。

改革只富了一小撮人

鄧小平的改革，毫無疑問的為國家的原始經濟數字帶來實質的改善。從1978年到1994年，中國的全國生產總值躍升了4倍，貿易額從1980年的381億美元增至1993年的1,958億美元。不過，這些原始數字掩飾著內部收入和財富的懸殊。這一邊廂，企業家們響應鄧小平所號召的「光榮致富」而聚積財富；另一邊廂，人民每年的平均收入只有6,000元人民幣，而

農民平均更僅及這個收入的3分1。所以農民會冒著嚴峻的禁制而流向沿海城市，成為沿海城市8千萬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的一分子，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我居住和工作的南方一個城市，是中國進行資本主義實驗的先鋒，帶有累累傷痕。現在，天際充斥著摩天高樓和半落成的樓宇，豪華房車和名貴車車與仍然用腳踏車載貨的苦力爭路，成千上萬焦慮重重的流民到處可見，他們為掙一口飯而吃盡苦頭，活在生活的邊緣。

即使生活是這麼困苦，農民仍是從各地流到深圳之類的經濟特區去。香港的廠主越境設廠，工人工資只及買一把煤球，而工作環境及工作安全又是甚為疏忽。據《南華早報》在去年聖誕節前報道，在深圳，每周約有1-2名工人死於工傷，逾400人肢體傷殘。

比起這些農民們稍處優勢的國營企業的工人，也同樣岌岌可危。勞工及社會安全部長張泰基在上個月承認，在未來數年裡，隨著中國市場改革升級，將有1千2百萬名國營工人失業。至於原有的上千萬下崗工人，他們每月僅得100元人民幣的收入，而且發現今後要由自己支付醫療及教育費。更有很多工人，由於所屬的國營企業把他們的退休金拿出炒賣股票而受虧損，從而失去退休金的依傍。加上難以數計的貪污自肥的黨幹部，令人民在百上加斤的艱難生活下更加怨聲載道。

中國鋌而走險

中國領導人正在採取鋌而走險的政策。中國現時僅僅是藉著大規模的鎮壓來維繫中國資本主義不平穩的發展。全球經濟的下滑將會令前述的緊張狀態加劇。克林頓政府最真實的目的，是打開中國市場，令美國商人有利可圖。他在1月間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支持一份批評中國人權紀錄的決議案，事前已向中國領導人作出知會。中國領導人將會作出投訴，決議案將不獲採納，以鬧劇結束，而兩國的統治者們便會重新回到他們的實在事務：盡其所能令人民生活的利益屈居在製造（商）利潤之下。

（史丹譯自《社會主義評論》2000年2月號）

世貿協議為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鋪路

梅茵

對於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事，美國終於結束了長期的反對態度。

作為交換美國分期削減進口配額的代價，中國同意對外開放農業、製造業道路和金融服務業的市場，撤銷外資不得擁有高科技公司超過49%股份的限制。此外，外國銀行今後可以立即在中國各地開辦商業服務，以及在5年內可以開設存戶銀行。

在1998年，中國總理朱鎔基同意不貶值人民幣，以挽救世界經濟大瀉。結果是令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只有單位數字的增長，是20年來最低。按中國官方發佈，是年增長率只有7%。而按國際貨幣基金會估計，更只有5.5%。此外，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也從前一年的700億美元下降至500億美元。

為了彌補海外市場的損失，北京在1998年8月宣佈一項龐大的國家投資計劃，包括投資1千億元人民幣予基本建設，及向國營企業提供1千億元信貸以維持生產。不過，國家對經濟作管制之重新確認，給共產黨內部的衝突，不論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都帶來了意義重大的後果。

朱鎔基希望減低國營部門，以在經濟方面全面為資本主義復辟作準備。但官僚中有另一份人作出反對；當國家恢復對國營部門的津貼後，後者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皆得到助長。

新中國首次經歷到通貨萎縮：物價、投資、銷售和利率皆全線下跌，與此同時則是貨物大量囤積、銀行存款大量增加。

對北京的領導層而言，給予日益虧本的國營部門更大宗的津貼，是中國復辟資本主義道路上最大的障礙。

世貿組織的交易，就此乘虛而入。朱鎔基由於無法開展國內經濟，在政治上打敗其他官僚對手，便轉而向帝國主義求援。如此，中國將撤除外資對製造業投資的限制，容許外商的零售活動，大幅削減入口農產品的徵稅，並規定國營工業購買較國內供應廉價的外來生產資料。中國向帝國主義廣開龐大的市場和物

資，對中國境內境外具有深遠的含義。

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它之箝制中國工人階級的能力，是植根在其對中國國營經濟的控制，及以農民為軍隊的社會基礎。

強行驅使中國進入資本主義復辟的決定性的一步，將對成千成萬人民的生活帶來可怕的威脅之餘，也將同時損害到官僚的獨裁專政，從而讓工人能乘勢起來，與政權算賬。

朱鎔基之選擇走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也將為能夠制止這種革命鬥爭的發展開闢道路。在這場革命鬥爭裡，工人階級不應和那些死硬的斯大林派和將領們打交道。

唯有工人控制和工人民主，才有可能挽救中國瀕臨淪落為世界跨國公司和跨國財團的耍樂場。全世界的5分1人口住在中國——對全球資產階級來說，這代表著無限制的利潤，足以讓整個資本主義順順利利走到下一個世紀。唯有一個嶄新的革命共產主義政黨，才能制止資本主義這個走勢。中國工人階級爭取權益的鬥爭，可見是多麼的任重道遠。

（史丹譯自《工人權力報》1999年12月號）



世貿會議成為抗議戰場

史丹譯

1999年底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以無法達成協議而失敗告終。代表著不同利益的資產階級集團，在對待「自由化」的問題上，各自持有異議；他們之間的敵意及不和，是令會議失敗的導因。雖然各個資本主義強國——其中尤以美國為最——的財雄勢大顯然的佔著上風，但亦無法挽回會議的結果。帝國主義列強的領袖們，顯然是無路可進，處於窮巷。

會議對《多邊投資協議》的反對，令帝國主義列強的領袖們嘗到一次挫敗。這項協議的用意，在於撤銷對資本自由流通的多項限制，俾讓資本能在全球自由活動，自由剝削其犧牲品。在會議舉行期間，位於西雅圖的大型示威，令多個國家的政府撤回對該項協議的支持。

同樣的，由於有愈來愈多人反對基因改造工程對生物組織作改造的食物產品，也迫使大型公司不得不作出策略性的退卻。

帝國主義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

在歐洲，推行戴卓爾式政策的舉動正在繼續下去，這當中包括著把對勞工和社會的保護取消。不過，德國總理舒密特由於向「社會國家」開刀而大失民望，而法國總理也因同樣的理由而步步為營。舒密特在遇到來自工人階級的反對的滋味之後，作出不光彩的退卻，動用政府貸款來扶助瀕於破產的一所建築公司。這個做法，正是與他任內的資本主義正統專家所主張的「自由市場」背道而馳。

歐洲中央銀行一意奉行戴卓爾政策，從而對舒密特現時的走勢大加反對。發生在歐盟心臟的這場危機，令貨幣市場憂心忡忡，致使歐幣劇跌，從年初的兌1.18美元跌至1兌1美元。

在美國和英國，兩地領袖對工人階級日益高漲的反對聲音也同樣的予以關注。

當《北美自由貿易地區》建立之初（它囊括了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令大量製造業移到勞工和成本低廉的墨西哥，這令美國的工會大受打擊。

貿易自由化只是統治階級的攻勢的其中一斑。美國資產階級為了打擊國內強大的碼頭裝卸工人工會，遂把墨西哥當地的碼頭工人工會粉碎，大肆發展接通美國和墨西哥的鐵路和公路幹線。

看來，克林頓和貝里雅是想把部份反對聲音帶進「世貿組織」大會的討論中去。與此同時，他們又對工會允諾，謂任何貿易協議都會包含最起碼的社會條款，以此來令工會解除武裝。這一切做法，俱是想把已有相當規模的抗議運動消解。

這個日益高漲的抗議運動吸引了新一代的年青群眾，它並且開始把半殖民地國家的工農群眾與資本主義大國的環保人士、青少年及工會份子聯繫起來，從而令資產階級倍覺受到威脅。

不少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就它們對本國勞工進行剝削而或會受到的任何限制這點，提出了抗議，認為這樣一來，便會使他們無法與已發展的西方作競爭。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成就」，就是建基在對國內由缺乏任何社會保障的童工和婦女所組成的廉價勞工，具有剝削之權。

此所以，諸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便會提出強烈反對，不贊成在貿易協議裡提及任何勞工或社會保障的條款。他們要求把有關討論從會議議程中刪掉。

除此之外，這些國家也全面反對贊同貿易自由化而來的，美國和歐洲資本可以自由投資，毫無限度的進入他們的國境。印度、巴基斯坦也和中國等較貧窮的國家一樣，不希望歐美的銀行能無拘無束地滲透到其國內。

至於日本和歐洲的代表們，當他們看到《多邊貿易協議》受到反對之後，則非常熱衷地重提其他課題，想在亂中過關。不過，由於幕後談判摒除了非洲國家的代表，致令非洲代表一怒之下離開會場，終於便使整個「世貿」大會敗興收場。

這次西雅圖會議所形成的矛盾，其根源來自帝國主義本身的矛盾。無論如何，在談判協議的過程中，在此或彼的階段裡，將會有新的衝突發生，從而令協議無法達成而導致「由其他手段把政治繼續」。帝國

主義的軍事專家們，已經為新的世紀劃下新的戰爭地圖，正在為他們的武器作嚴格的檢定。

新的抗議聯盟誕生

在「世貿」會議舉行期間，龐大的群眾示威令西雅圖癱瘓，令若干「世貿」會議項目被迫取消。

12月初出現在西雅圖的抗議行動是一場力量強大的運動，它把年青學生和深富經驗的環保行動、爭取社會公義行動的活躍份子結合起來。這是一個剛開始的聯盟，把法國的農民、英美工會人士、貧窮國家的貧農、土著，及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聯合起來。這個運動包含著廣泛的政治立場，從自由主義改良者、希望用恭敬的「公民行動」以向權威施壓力的人士，到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的，各種立場都有。

在「世貿」會議舉行之前的日子，在法國，就有成千上萬的農民和環保人士大遊行。他們最懼怕的是無法阻止輸入含有基因改造的美國食品；他們也同樣害怕美國的文化產品蜂湧而至，致把本國的文化淹沒。

在美國，「勞聯——產聯」工會運動也發動了抗議行動，因為大量的廉價進口貨品已經對美國工業工人的職位和生活造成了威脅。美國工人歷來在本國的工業爭取到工資和工作環境和各種社會福利；現在，這些都受著威脅。成千上萬名工會基層成員請假到西

雅圖抗議，他們並且十分熱心地參與示威期間舉行的研習班和各種討論。

美國工人成功地迫使美國出席「世貿」會議的代表，就設定普遍適用的社會最低標準的總體方向，擺出漂亮的姿態。

英國工人也不遑多讓。在「世貿」會議舉行的首天，他們在倫敦舉行了一次響應西雅圖大示威的抗議行動，提出工作安全的主題。

來自美國的學生，令這次西雅圖示威的規模擴大。

美國警察用胡椒粉和催淚彈鎮壓示威者，但示威者並未被嚇倒。發起西雅圖大示威的主力之一蘇珊·佐治在總結這次示威行動時指出，資產階級會守待時機，等候運動作出階級、性別、種族、年齡或宗教的分化。

經驗說明，蘇珊·佐治的警告是真確的。剝削者的慣技，就是「分而治之」。這個運動所需要的，是不僅一個蘇珊·佐治；運動需要有「本身」的腦袋，需要一個能夠抵擋統治階級的攻擊、能把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團結和創意在鬥爭中經常推進的一個能思考和活躍的領導。

（史丹摘譯自《工人國際報》1999年12月號）

世貿社會條款與社會反抗

——社會運動如何抗衡世貿組織等國際機構的攻勢

霍爾曼

要求把社會、環境和保障民主的條款納入世界貿易關係的呼聲，主要是來自北方國家和僱主聯會。此外，來自工會和其他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也加進一把聲音。

形成主張〔在貿易協議中加入〕社會條款的議論，主要有兩類來源。第一類是來自所謂「社會大傾銷」的意識（所謂「不公平競爭」），即認為南方國

家由於具有低工資和落後的社會保護制度，因此較諸北方具有著殊不公平的競爭優勢，所以要用徵稅等方式來將之消除。

更有些人迅速地把「社會大傾銷」看作造成工業國家失業趨勢的主要成因。在北方，最備受低工資入口產品影響的經濟部門（如紡織、成衣、皮革）的僱主，多會贊成社會條款。

至於同樣主張社會條款的工會和人道組織，它們最主要的用意，是使到由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所界定的最基本的社會權利保障（工會權利、廢除童工等），得到強制性的施行和遵守。事實上，正是發展中的國家，會是首當其衝，被要求寫入社會條款。

來自「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倡議，更堅持社會條款具有如下的雙重目的：必須尊重人權；防阻無恥的公司取得競爭優勢。

「環境條款」發揮完全相同的作用，目的是防阻不符合維繫環境循環管理的產品、服務和生產程序的買賣貿易。

並隨著社會條款和環境條款而來的，是民主條款，用意是處罰不尊重最基本人權的國家，把這些國家置於國際市場的裁判。

工會組織和人道組織對於童工遍行全世界尤其不可忍受，它們提議設立某種國際社會基金或某種支援銀行，經費來自向違反「國際勞工組織」條款的國家徵收關稅，以回饋到這些國家，用作發展計劃。

鑑於「國際勞工組織」並無制裁的機制，所以一些國際工會組織建議前者和「世界貿易組織」共同設立一個聯合諮詢制度，以在有需要的時候，對違規的國家施行報復性措施。

破「不公平競爭」之神話

在這些提議和辯論之中，涉及了許多問題，有需要加以釐清。尤其是對於那些在南方、北方及東方進行國際團結支援工作，社會改造工作，回應工人及民眾的共同利益等工作程序中活動的個人和團體，更是這樣。

我們對失業和業務遷移，該怎樣抗爭？我們該怎樣維護、怎樣加強社會基本權利、結社自由、談判自由？怎樣禁止童工……？在「世貿組織」包庇下進行的貿易制裁——主要是針對第三世界國家——能夠為解決問題帶來公平、公正和充份的結果嗎？

在當今全球力量關係的架構下，引進社會、環境和民主的條款，會否令工人和人民百上加斤呢？

真正的辯題，乃在於干預和條件性。一些工會組織擁戴為了達到社會目的而運用社會干預或經濟保護主義的權利，以此來對待容忍社會大傾銷、不遵守「國際勞工組織」規範的南方和東方國家。

不過，對於誰該為北方、東方和第三世界的失業

和貧困負有實在的責任這點，社會條款這類措施會不會犯有把原兇掩蔽起來之弊呢？也即是，把財雄勢大的金融集團和經濟集團（尤其是那些跨國公司）遮蔽起來。我們會不會不明智地助長了經濟保護主義，令所謂發展中國家蒙受其害？對那些令第三世界普遍貧困必須負有重責的北方機構——不管是金融性的（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經濟性的（世界貿易組織）或政治性的（七大工業國集團）機構——我們會否犯有替它們掩飾之弊？

還有，由這種態度而挑起的競爭，或加速工人間的競爭，不是會令來自不同經濟部門、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之間的工人不和嗎？

這又回到我們的基本問題來：處在今天的我們，該怎樣增強南北兩地間的工人、工會、社會組織和民眾之間的團結？我們發展這種團結的目的，是爲了什麼？

必須聯結勞工成本的單位——生產力，來看待與低勞工成本相提並論的社會大傾銷（「不公平競爭」）。

在南方、東方（也包括北方），當地生產者之間的工資成本之差異，是和低生產力水平相結合的。其水平比諸跨國公司或它們的轉承包商所達到的生產力水平，遠要低出許多。所以，光談什麼「不公平競爭」，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對產地商來說，低工資在本質上正是反映了生產力水平的差異；任何關稅（關口稅）或非關稅措施（入口配額限制）只是用來削減南方國家的銷售。假如用一刀切的方式把工資成本拉平，便勢有可能把南方諸國全盤消滅掉。

反過來說，Nike和Adidas之所以把99%的生產線移到亞洲，這很清楚的，乃是由於付給亞洲工人的可憐工資，輕而易舉的就能蓋過了高生產力水平。跨國公司和轉承包商之間的關係（尤其在第三世界），顯彰出這些跨國公司對社會大傾銷需要負上的責任。轉承包商需要負擔生產的風險，他們是制度性的逼著要尋求最低的成本。這樣一來，便形成頻繁地轉移生產地域。而在同時間，跨國公司又每每向工會活動訴諸威脅、恫嚇和壓迫的手段。出於同一理由，轉承包商被逼要違反當地法例和「國際勞工組織」的規範，哪怕Nike和其他全球公司採用有「良好行為法則」。

當我們議論社會、環境和民主條款時，必須顧及經濟、政治和機構方面的來龍去脈，不能在資本全球化的語意之外（即是「不包括」全球化）來說。資本之全球化，主要由巨大的產業集團——尤其是三合國（歐盟、北美洲和日本）的跨國公司之間的殊死競爭表現無遺。跨國公司——尤其是頭200間——以各種方式控制了全球70%的貿易和投資。全球化的過程，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在全球化的世界市場選定的融合過程來運作的。

按F·謝斯尼在《資本現代化》（1994）一書所述：「三合國的跨國公司和商行，只對有數的第三世界國家有興趣應用選擇性的關係。一些國家一如既往的，仍然給看待為原始物資的來源（但這種情況是日趨稀罕了）；其他國家，則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貿易的集中而作為重新安排轉承包工的基地，這些基地由於十分低廉的工資成本而富有吸引力。另有一些國家，是由於具有潛在的龐大市場而成為目標（例如中國）。不過，除開這些特殊事例不論，三合國需要的是市場，它們絕對不需要重要的工業對手……」

藏在良好意向的偽裝下推出來，旨在制止社會大傾銷的社會條款，事實上是對最糟糕的保護主義方式效勞，為其開脫：保護富人的保護主義。

像這種保護主義，已經生氣勃勃，龍虎精神。事實上，聯合國發展計劃部在1992年提交的報告，對此已作出最明白無誤的譴責：「在24個工業國中的20個國家，它們較諸10年前更富保護主義性；它們的保護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損害發展中的國家而作出的……總體來說，按我們能作的估價，世界市場的限制令發展中國家每年損失大約5千億美元。這宗數目，相當於全球發展中國家的全國生產總值全數的20%，相當於它們用在人文發展方面的開支的7倍。」（《聯合國發展計劃1992年報告》）。

倘若真的要運用上社會、環境和民主條款，倘若要動用報復性措施以打擊不公平競爭和超級剝削，那麼，施用的對象，首先就該是針對跨國公司。因為正是它們控制了全球70%的貿易和投資；正是它們不斷的轉移生產地點，有計劃地迫使轉承包商尋求最低的生產成本，是它們在工業自由區內壓迫工會。

拆解「結構調整計劃」

一些工會、社會組織和人道組織希望動用社會條

款，以作為硬性推行尊重基本社會規範的有效工具。但是，有必要把社會規範和社會條款區分開來，這點十分重要。

社會條款是與貿易協議聯繫起來的，它是一眾國際機關（如「世貿組織」）之間的競爭的延續。

包括「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3個國際性工會（另外兩個是CMT和CES）發表聯合聲明，要求「國際勞工組織」與「世貿組織」設立一個聯合諮詢委員會，以便對違反「國際勞工組織」規範的國家，讓「『世貿組織』作出適當的多邊貿易的回應」（「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提交世貿組織首屆部長級會議的工作文件》1996年）。

「世貿組織」之作為基本社會權利的擔保人，這個功能、角色和合法性是問題重重的。它怎能一邊攻擊所有杜塞「自由競爭」的障礙物的同時，又相反地作出管制，做出截然相反的事情？當競爭（包括工人之間的競爭）的「邏輯」是妨害到個人和人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權利，它又怎能在同時顧念到這些方面？

上述那些國際工會組織，除了希望把「世貿組織」帶進來之外，甚至也想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國基會」）也拉進來。

世界銀行和國基會所擁戴的宏觀經濟改革，是和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權利背道而馳的。

佔著領導地位的跨國公司控制下的直接投資的重組，利用金融市場自由化之利，指引著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球化。這種種直接投資把勞工全面重整，將之調較到全球的規模，令每個社會制度和每個生產單位處在競爭和敵對之中。國基會所行的結構調整的政策，正是作出調較以配合這個現實。它擔任的「調較管理」的角色，用意不在於限制投機性的金融市場的權力，卻倒是用來監督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政策。

眾所周知，繼1982年墨西哥債務危機之後，世界銀行和國基會的運作，就是把南方和東方的負債國置於監護之下；換句話說，就是剝奪了它們的主權。

所謂「結構調整計劃」，就是要貧國應富國的要求而作出調整。更準確的說，是要貧國的貧民，按照由國際性的經濟集團控制下的重組直接投資的要求而作出調整。在這些貧國內部，由這種新生的依賴關係而獲益的富裕階級，也同樣迫使貧民及日漸貧窮化的階層作出調整。

而這種調整，是發生在這樣的一種情勢之內，即世界經濟中有整整一個部份是逐漸地脫離出交流的程式，也就是被排除在全球化行列之外。

在相當程度上，這種機制是正在全世界通行。不論在北方、南方或東方，這種機制的轉換語就是生活水準日趨低落，失業日趨高企，生存的條件日趨敗壞，有更多人被排除在社會之外。就在這個分析框架下，我們可以著手把「結構調整計劃」和人權之間的符碼拆解。

人權在形成觀念及達致憲法層面之初，是把婦女的人權排除在外的；人權經歷了4個階段的演進。第一代是針對個人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第二代推及社會、文化和經濟權利（後者指就業權、有收入權、有房屋、教育和健康等權利）。在第二次大戰之後，這些權利在社會立法中被奉若神聖。

第三代的人權在1960年代出現，並象徵性地由聯合國第1514號關於反對殖民主義的決議案採納而得以命名。民族自決權自此後成了人權的一部份。1968年後，聯合國通過了一系列的決議案，相繼就個人或社群的權利作新的擴充，包括女性權利、兒童權利和反對種族主義等。第四代的人權，大抵是全體人類的權利：生存權利。這種權利不僅把食物和能源包含在內，並且是廣及更闊的課題，即整個生態。這4種人權，是緊密相扣，互不可分。

跨國機構一元一票制

要是拿國基會（在世界銀行的協作下）實施的「結構調整計劃」來和上述4種人權作出比較，便會立即發現兩者之間的當然矛盾。由國基會所提議的模式，及由它的借款條件所作的箝制而實施開來的結果，就是逐點逐滴的把這些人權取消。

國基會、世界銀行和7大工業國集團的論述，是把個人權利和社會權利分離開來的。認出這點，實是至關重要。

作為借貸的條件限制所提倡的「良好管治」這個觀念，實際上是指要優先尊重個人的權利——而這種尊重，實在又全然是表面上的。譬如「自由」選舉，便被假設為是這類型的權利的具體表現。至於社會權利在何時實施，卻可以是遙遙無期，或擱在「結構調整計劃」得到得當的實施之後；至於何謂「得當」，卻難以找出個真正的標準。

說到個人的權利，饒有興味的是，國基會和世界銀行均是奉行人口稅制式的運作制度，它們的內部運作（決策權）是根據成員國的財政貢獻多寡而定。結果哩，是49個非洲國家合起來的投票權，要較比利時一國所持有的5%控制權還要少。此乃是一元一票制。9個國家（工業最發達的9國）在國基會24個管理層成員中，共佔了56%的投票控制權。光是美國——世界上負債最多的國家，就分別佔了世界銀行和國基會20%的控制權。

因此，這種制度本身，就是否定聯合國所確認的民族自決權的。再者，這種制度暗示到，掌管結構調整計劃的經理人們並無責任，因此國基會及世界銀行也是毋須向那些備受到結構調整影響的國家作出交代。而由於這兩個國際機構推行的方案和計劃等等，並無需要接受外界的獨立評估或獨立的財政審核的批核，所以就更不會被人追究了。

結構調整計劃造成的社會——經濟效應，意味到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將導至人口中的整整一個層份，被粗暴的推向社會邊緣化，也即是在事實上令他們被排除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之外。

全世界現有10億文盲，其中有8.4億人是第三世界的成年人（當中3分2是女性）；這項事實，顯示出人們的公民權利和市民權利受到侵犯。至於結構調整計劃的全部政策，亦是和社會權利背道而馳。由國基會擺佈的國家的財政預算案，壓制國家對基本物資作津貼，這勢將導至公共服務的毀滅；此外，又規定國家實行進口所有貨物的政策，以此來為債務效勞……如此種種措施，俱為製造赤貧、製造絕對貧化，同時又保證讓中間階層和特權階層大受其惠的機制大開門戶。

損害兒童權利是最嚴重的一環。眾所周知，第三世界兒童營養不良的情形十分嚴重，世界銀行也無法不承認這個事實。而更嚴重的是，長時期的營養不良（如持續3—4年）將會產生長期的後果，甚至有跨代的效應。人們現時及未來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全面受到威脅，但會有哪一個國基會的人員，會被召到人權法庭上為他們對人權的侵犯作答辯嗎？結構調整計劃對環境及城市化所造成的影響，意味到對第4代人權的侵犯：生存權。

國基會和世界銀行在1970年代貸款予規模龐大的開發計劃，這些計劃對生態造成嚴重的破壞。當借

款國無力償還債務，尤其在1982年的債務危機後，有為數更浩瀚的天然資源被消滅殆盡，以此來償付債務。在全球層面，發展中國家因此而失去43%的原始林地，這些原始林地是永遠不能復原的了。

據《聯合國發展計劃1997年報告》所述：「第三世界的森林的毀滅，因而對威脅著我們的整體氣候改變，要負上5分1的責任；因喪失森林而致的溫室作用在短短10年間上升了50%。」

貿易制裁不利人民大眾

企圖強制第三世界國家尊重「國際勞工組織」的社會規範，或企圖用貿易制裁之類的條款來保護就業的措施，不一定是最公平、最公正或最適當的解決方法。從「為達到社會目的而運用保護主義」到與僱主組成策略性聯盟以保護「我們的」生意，只是一線之差。這種解決方法早晚會令本身所屬的國家陷入更大的社會退步。

對南方或東方國家採用杯葛措施，同樣會犯上只對受杯葛國家的民眾產生不良作用的毛病。

當然，我們不能完全排除對某些國家、某些公司進行杯葛或制裁的做法。但重要的是，這些措施應該是作為響應受影響國家或公司內的工會或社會人士的要求而實行，以他們的要求作為決定的根據。只有通過社會動員，才能令南方、東方及北方達致社會和司法方面的進步，捨此別無其他神奇的捷徑。

在這個大體上已國際化的經濟制度下，任何一個社會的退化，皆會被當道的有權者乘機侵食，並經常帶來整體性的倒退，而這種狀況又會被解釋成競爭所使然——它將會如何結束，卻是不得而知。

可是，我們知道這當中承載著戰爭的邏輯：「我們要是不夠競爭力，便會有其他人用更低廉的工資、更彈性的時間和更惡劣的工作條件來做我們的工作。」

建基在別人的疾苦之上的富裕，和加強競爭，實際上只會導向整個的敗壞。不管是一個行業或一個國家，任何針對工資、工作條件、工會自由及適齡工作的法定年齡所取得的社會進步，只會對其他行業、其他經濟部門及其他國家的人民帶來好處，並且也會把權力關係扭轉為合作的關係。

社會鬥爭採取的方向

這些社會進步意味到工人組織的自由和社會運動組織的自由，社會運動和人文運動的國際性團結，民主組織和進步組織的協作。動員是與司法進步和立法進步緊密相聯的，因為動員通常為司法及立法的進步提供了基礎。

在國際憲章和國際協議中寫入人民及人民的基本權利既然重要，那麼各個進步組織、政治組織、工會和社會組織用自主和獨立的工具把自己武裝起來以發揮真正的社會控制，這點就更為重要了。

我們的課題是掌有抗衡權力的可能性，以便能夠進行探索事實真相的任務，譴責不公義的狀況，並且用動員來強制實施、尊重基本權利。譬如說，假如通過由社會抵抗團體所支持的獨立的抗衡權力搜集得來的調查結果，對國基會及世界銀行的方向和做法予以譴責，是大可以發動起大規模的動員的。在建立這種抗衡權力方面，國際性的聲援組合負有尤其重要的責任；而建立這種權力的條件之一，是要求有透明度，及民主管制的運作。

在20世紀結束之時，我們的社會在技術、科學、金融和人類能力方面，誇言能夠確保整個星球上的居民有最起碼的、不可或缺的豐足。然而資本主義經濟每日都無法滿足人類最基本的需要，無法令技術進步的潛力帶來果實。

以社會為基礎，滿足最基本的需要，才是勉力以赴之目的，而非為了達致私人的利潤。要達到前者的目標，沒有捷徑可循。我們必須與新自由主義決裂，改而為另類的途徑、另類的建議和實踐效力。

例如，通過要求勾銷第三世界的負債、結束「結構調整計劃」，容許貧窮國家得與世界市場保持起碼的距離，我們能夠為耐久的發展鋪平道路。我們可以托賓稅（Tobin tax）動用為發展基金，可以通過實行真正的農業改革來支撐社會流動。

不消說，走這樣的道路便有需要與南方建立新的關係，這個新的關係是以團結、社會正義、當地人民的利益為基礎的。

這樣一來，便意味到北方的工會和社會運動，必須全心承擔責任，拆毀新自由派的堅實堡壘。

（本文作者丹尼士·霍爾曼是報人和經濟學家。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1月號）

分離主義運動動搖印尼政府

霍理

99年10月間，一個試圖擺出民主面孔繼續新殖民主義統治的印尼政府任命出來了。現在，新政府的穩定，正受到的不同種族要求自治的強大運動所威脅。

那些地區是孤立的地區，其居民由於軍事鎮壓的逼迫而長期不滿。現在獨裁制的倒台，為積極地大量表達從印尼政府分離出去的意見開闢了道路。

11月8日，在蘇門答臘阿齊省首府，一百萬人示威遊行，要求公民投票表決獨立。那幾乎是這個小民族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

自從「民主的」政府被任命以後，在印尼首都雅加達，阿齊人血統的學生和人民在政府大廈前面發動一次最大的示威遊行，要求公平和懲罰軍官在阿齊人反抗中侵犯人權的罪行。

11月26日，印尼最大的一家日報康帕斯報道：在阿齊省和其他地區，民族鬥爭的興起使股票指數降低了17點，並且使外國投資者不安，而把他們的資本分散到香港和新加坡去。

阿齊人有一種歷史性的特性，它是伊斯蘭教在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橋頭堡，保留著正統的信仰，它是抵抗荷蘭入侵的群島的堡壘。

爭取阿齊獨立的運動，曾經被認為與伊斯蘭教相一致，並因此在印尼對新政權提出一個特別的難題。

瓦希德成為總統之前，他是Nahdatul這個最大伊斯蘭教組織的領袖。為了重新鞏固他們在新體制中的統治，保守的伊斯蘭教是新殖民主義的根據地。

但是，蘇哈托獨裁政權殘忍鎮壓阿齊的獨立運動被視為它對伊斯蘭組織的一般鎮壓態度。這個政策夾雜在其他事件中，誘發了1984年在雅加達地區的大屠殺。

因此，瓦希德對阿齊地區提出公民表決權的要求採取調解的態度。11月10日康帕斯報發表新聞引述瓦希德的話說：「如果東帝汶得到機會來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為什麼阿齊人不也能得到？」

瓦希德繼續說，他肯定阿齊人民將會抉擇留在印尼內。但是，他對公民表決權的贊同，立刻招致軍方

的代表和哥爾卡（Golkar）這個軍事獨裁黨的猛烈批評。

11月12日，康帕斯報報道：中爪哇麥哲倫軍事學院由一群將軍召開的一次新聞發佈會（包括軍隊總參謀長蘇百治奧·赫第茨斯窩約將軍和前副總統特里·蘇圖里斯諾兼前阿齊省的軍事統帥）宣佈。他們拒絕阿齊人開創先例，並且建議阿齊問題應「在國家統一的組織架構內」，寧可由一個全印尼公民表決來處理，而不要一個反叛的地區來進行公民表決。

11月18日，瓦希德無前例地召開國會來解釋他對阿齊的政策。這是爭論激烈的會議。同一天，法新社報道，國會代言人，哥爾卡黨員告訴希瓦德：國會反對公民表決。

11月17日，國家警察首腦羅斯曼哈第將軍宣佈要加強戒嚴令於阿齊一些地區。但是這個建議被哥爾卡的領導人和瓦希德的新檢察總長所反對。軍隊總參謀長蘇伯治奧·赫第茨斯窩約也吹捧戒嚴令，但它被印尼軍隊司令官維蘭托所反對。

中央政府明顯地處於進退維谷的境地，大眾支持自治政府表現在11月8日的示威運動。總的不穩定形勢遍及群島，事情發生的來龍去脈預示著，在阿齊省，任何試圖鎮壓將激發起一連串的動亂反應。但同時，為了同樣原因，在阿齊，國家鎮壓機器正在瓦解。

11月27日康帕斯報報道：「正在傳聞18個地方法院的全部案件被取消，是由於塞拉姆·梅卡赫（屬阿齊地區的原告）和法官的爭鬥。」它繼續引用阿齊首席檢察官素爾卡諾·伏素福在省會新聞發佈會上述說：「法官和檢察官矛盾的根源是密切地與不穩定的局勢相連繫的。這種情況近來在阿齊已經很普遍了。」

「不穩定的局勢」顯而易見地是鎮壓的制度正在使國家的代表們站立的地方燙腳了。此外，伏素福訴苦說，即使國家的法律代理人的脊骨挺得硬，他們不能做到什麼來。「當監獄不能再使囚犯坐牢，我們如何去執行判決呢？」據康帕斯報報道，大部份的犯人

已經逃跑了。

阿齊問題就這樣在政府和軍方兩者內部打開了一道裂縫。前陸軍司令維蘭托將軍深深地被牽連在省裡侵犯人權的罪行，現在受到審查。而且這只是由於他指揮東帝汶大屠殺和鎮壓雅加達學生遊行示威而被貶職之後。

維蘭托太喪失信用到成為哥爾卡黨的副總統候選人，可是他已經被包括在瓦希德政權之內。無論如何，根據《遠東經濟評論》雅加達通訊員約翰·姆克帕瑟的消息，維蘭托在軍隊的建制中，仍然是中心人物。

「因為緊張的氣氛瀰漫阿齊的上空，這是很清楚的，軍方並未因為選舉瓦希德總統而退出比賽場地。真的，所有的跡象都暗示前武裝力量司令維蘭托將軍，在他的新職位中等同於國防安全部長，不僅安置他自己在瓦希德政府的核心，而且還保留在軍隊中有力的領導地位。」

瓦希德處於牢固的地位，亦因為他拒絕提供阿齊人比有限的地方自治權更多的任何東西。這個自治權似乎太小了，太遲了。悉尼先驅晨報11月25日報道：

「在訪問中東期間，瓦希德先生說：他早先承諾的公民表決權只適用於伊斯蘭教教法的序言或伊斯蘭法，但不是獨立。

提到阿齊人要求表決自治，瓦希德說：不，不，決不！因為所有的國家，包括美國在內，都支持印尼的主權超過這個國家的所有地區。」

這家澳大利亞報紙繼續利用領導阿齊人的人權積極份子阿伯道爾·加尼·諾丁回答瓦希德的話說：

「這全部是錯的，獨立是無商議餘地的，阿齊已經遵從伊斯蘭法。」諾丁警告說，除非人民得到同意獨立的表決，否則「它能在戰爭中挺著。」

作為政治鬥爭的結果，單是99年在阿齊地區就有大約300人被殺，包括88名士兵。這似乎很清楚：瓦希德和梅加瓦蒂的「民主的」新殖民主義政府不能對付自決權的要求。

在印尼，為權利而鬥爭正在成為繼續激進化的關鍵部份，這是一個只有增強革命力量，通過自決權一致的認識，變成一個能夠團體所有的工人和受壓迫的人民的策略，這樣才能著手解決問題，在鬥爭中對抗新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制度。

（柳真譯自《社會主義者行動》99年12月號）

《十月評論》代售下列書籍

歡迎郵購

中國革命問題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平裝/精裝）	彭述之著	30/45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平裝/精裝）	彭述之著	45/60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平裝/精裝）	彭述之著	35/50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元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雙山著	15元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山著	4元
印支問題		雙山著	3元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伊文思著	3元
斯大林與中國革命		托洛茨基著	4元
中國革命底總結與前瞻		托洛茨基著	6元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		托洛茨基著	10元
托洛茨基致中國托派的信		托洛茨基著	4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經濟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社會和經濟	曼德爾著	20元
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	曼德爾著	10元
晚期資本主義	曼德爾著	45元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	曼德爾著	24元

托洛茨基著作

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著	40元
過渡綱領	托洛茨基著	9元
論蘇聯的國家性質	托洛茨基著	22元
蘇聯的歷史大冤獄	托洛茨基著	5元
文學與革命	托洛茨基著	25元
十月教訓	托洛茨基著	10元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托洛茨基著	5元
論學生與知識份子	托洛茨基著	3元
熱月反動	托洛茨基著	3元
新路向	托洛茨基著	5元
流亡日記三種	托洛茨基著	5元
戰爭與第四國際	托洛茨基著	5元

其他

不斷革命論ABC	意因著	6元
第四國際簡史	法蘭克著	14元
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	格瓦拉著	20元
匈牙利悲劇	弗萊雅著	8元
1968年法國革命	南燦譯	18元
鄭超麟回憶錄	鄭超麟著	20元
托洛茨基畫傳	則誠編	8元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著	12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50元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9481 4926

印尼婦女勞工領袖出獄

——第塔·莎莉訪問記

蘭尼

〔《勞工旗幟》編者按：第塔·莎莉（Dita Sari）爲了支持印度尼西亞血汗工廠工人的權利，經過三年的監禁之後，於99年7月3日釋放了。有關她的文章發表於8月11日澳大利亞報紙《綠色左翼周刊》。第塔·莎莉於8月中在澳大利亞作兩週的旅行。在美國，這篇文章被《勞工覺醒》（一個爲勞工權利鬥爭服務的社團，反血汗工作的組織）高度地評價，而向它的支持者推薦這篇文章。〕

「在監獄之外最好的事情就是能夠在工人之中重新進行組織，他們是真正的激動人心的人。」當我們驅車向大都會雅加達警察局的時候，第塔說。

第二天，8月1日，「印度尼西亞勞工鬥爭民族陣線」（FNPBI）舉行一次公眾集會來展開他們的鬥爭。警察在最後的時刻，根據「在公共場所發表意見法」干預這次活動。

她說：「明天的宣告大會將有爪哇、蘇門答臘和蘇拉威西幾個城市的代表參加，我們要看看警察是否敢於驅散我們。」結果，警察灰溜溜地離開了會場。

印尼工人運動的新階段

自從第塔被釋以來，她就忙於幫助領導FNPBI，她是這個組織的主席。她認爲印尼工人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而FNPBI是本地工人行動委員會的聯合陣線，那是未來的行業聯合同盟的雛形。

在8月1日幾百個工人的集會演講中，她說：在6到12個月當中，FNPBI本身將要改變爲行業聯合會。

「我們有了服裝紡織和鞋業聯合會的雛形，我們也在化學運輸部門有了組織。我們的組織在許多城市中起到重要的行動領導作用。最近在米丹、泗水和東爪哇也曾發生過重要的罷工，尤其在香煙部門。我們在泗水的基地只在最近才恢復活動，並取得良好的進步。最好的情況是工人們自己準備去鬥爭，尤其在他們緊迫的經濟需要方面。」

工人們的熱忱

集會加強了第塔聲明中關於工人鬥爭的熱忱。在時間表開始之前一小時，雅加達中心的觀眾席上幾乎都滿座了。來自遍及全爪哇的工人，那天早上都搭上了接送的公共汽車，當時也有來自好幾個城市的代表，全都是青年，一半是婦女。

「我曾到過雅加達這裡的好幾個基層」，傍晚前第塔解釋說，「但是有許多組織者和基層我還未能會見過。明天將是一個好機會對更大的一部份會員講話。」

新的組織運動的展開持續約四個小時，並且有幾個精彩的場面，一個奇異的工人劇院的演出，以鬥爭的需要來鼓舞觀眾，取笑工廠老闆和管理人員。在差不多三十分鐘長的詩歌朗誦中，觀眾忍不住捧腹大笑，並大聲挑戰。一曲流動演唱運動的贊歌「流血的鬥爭」，使工人們站起來重申他們的贊同。

第塔開始她的演說是從闡明1994-1996年期間工人積極分子是怎樣組織印尼勞工鬥爭中心（PPBI）開始的，隨後又怎樣於1996年被鎮壓破壞的，那時候她作爲PPBI的總書記而被捕。依格那提奧斯·普蘭諾沃（Ignatius Pranowo）現仍被監禁，PPBI的活動分子被軍隊追捕，著名的主要基層被恐嚇，龐大的反聯合的宣傳也產生了。

「因此，不得不採用新的方法來重建運動」，她說。「不論什麼地方，有工人抗議者都要建立本地的委員會，不論哪裡的工人都能夠更永久性地組織起來。我們不在PPBI的旗幟下鬥爭，只利用本地組織的旗幟。現在FNPBI能夠把許多這些本地小組織聯合起來，並幫助準備一個具有全國性前景的運動。」

現在的形勢

第塔概括了這個時期改革的形勢，堅持需要一個

全國性的組織。「自從蘇哈托被迫辭職以來，形勢有了轉變。在報上討論了許多事情。這在蘇哈托時期是不能在報上討論的。有許多新黨派成立了。甚至超過15個新的行業協會也成立了。你有抗議和示威的主張，可以通過社會來擴散……但是如果我們要問工人們得到了什麼具體利益？我們一定得出幾乎沒有得到什麼的結論。那是真實的。法律已經改變，允許行業聯會登記註冊可沒有比SPSI（由政府欽定和控制的工會）來得更方便。但是當我們要註冊時，就在路上遭遇到許多官僚設置的障礙。政府的政策有兩重性。在頂層宣佈改變了，但基層根本沒有變動。我們的活動分子仍然受恫嚇，和受老闆付錢的暴徒毒打。」

第塔肯定了許多工人的經驗。「『安全措施』和使用暴力仍然是我們每天在基層所見到的。他們要恫嚇我們，因此我們過於害怕而不敢成為積極分子。」在這一點上，第塔向其他協會的代表們（包括全印尼工人改革協會，繁榮印尼工人聯合會和印尼穆斯林行業聯會）呼籲，她說：「讓我們團結在一個單一的議事日程後面，結束這個恐怖和恫嚇，廢除軍隊的兩重作用。」

工人們需要繼續參議政治問題

再過幾天之後，第塔強調大的挑戰就是要提醒工人的運動需要參與政治問題。「1998年的大動亂把大部份工人忽視了。」她說，「我在監獄裡接到報告，極少數的工人參加大示威和在行動上反對獨裁。這就是為什麼FNPBI也在它的綱領中採取政治的要求。特別是要求廢除軍隊的政治角色。」

那是很清楚的，壓倒性多數的FNPBI工人在公眾的集會上完全支持這個政治綱領。但，第塔在她的演講中強調這一點：「工人鬥爭不只是爲了提高工資、交通運輸津貼、月經假期等等，雖然這些都是重要的。工人的鬥爭也就是政治鬥爭。甚至在經濟基本條件取得勝利，我們也需要結束恐怖。軍隊長期以來一直都能在我們的全部鬥爭中加以阻撓，那就使我們難以同僱主取得公平的協議。工人們必須能夠參與決定所有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

梅加瓦蒂不關心工人

第塔也談到需要把工人的福利放在國家的政治日

程上：梅加瓦蒂在她最近的演說中提出她的政策，有關工人的事情她提過一次嗎？她問道。觀眾們大聲地喊，「沒有」。「但是誰投了梅加瓦蒂的票？她取得的地位應歸功於誰？第塔把這歸功於一般的工人和群眾。我們一定要要求印尼民主鬥爭黨（PDIP，梅加瓦蒂黨），對她的選民負責到底。我們把我們的綱領向前推進，任何新政府必須在它任期的第一百天內爲工人們取得成就。」

但是要達到這些要求，第塔繼續闡明說，單獨戰鬥還是不夠的，「我們一定要和學生、農民、市郊貧民攜手並進。」她又提到九十年代早期學生和工人聯合行動的歷史和學生怎樣成爲FNPBI的積極分子。

爲了改造，在運動的發展中，工人的力量將擔任戰略的角色，她解釋說：「你們必須維護這個組織，保護你們的領袖們。下到基層去，不要讓1996年PPBI事件重演。」

最後，她向觀眾呼籲繼續奮鬥，第塔轉回到基本的動力：結束勞動人民的苦難。「我被監禁三年剛釋放出來，那是痛苦的，被投入監獄是刺痛的。但是，我知道在監獄外有更多的痛苦，更多的傷害。工人萬歲！人民鬥爭萬歲！」

「在與印尼和東帝汶的團結和行動方面，我宣佈第塔將要訪問澳大利亞，並且在那裡將對工人們演講，集會反對澳大利亞政府不公平的勞工法。」這個宣佈受到歡迎並爆發出一陣歡呼聲。

他們把社會變成監獄

第塔曾蹲過三個監獄。第一個是在泗水的曼丹監獄，當犯人暴動反對太多的苛捐雜稅時，這監獄被燒爲平地，她被遷到馬蘭的一個小監獄。她說，「那是最糟糕的時期。」「我單獨地被囚禁，八個月不允許看報紙、聽廣播、看電視。」「當我被遷到雅加達唐格蘭格女監時，情況才稍爲改善。但是監獄畢竟是監獄。在監獄要避免的事情，他們卻在監獄外面把社會本身變成監獄。」

（柳真譯自美國《勞工旗幟》99年9、10月號）



(轉載)

團結支持東帝汶

第四國際國際執委會

由印尼軍隊庇護下的恐怖主義民兵，對東帝汶進行大屠殺和大肆破壞之後，聯合國終於派軍進入東帝汶，而印尼政府除了不得已地撤出東帝汶，亦無其他選擇。

這個結果之可能發生，乃是東帝汶人民數十年來為爭取自決和獨立而不懈地進行英勇鬥爭的結果。大規模的群眾動員，及〔99年〕8月30日全民投票的結果，清晰無誤地顯示出——要不是早已表明——東帝汶人民要的是獨立。

這個結果之可能發生，同時也是全世界多個國家的動員和國際間的公共輿論施加壓力的結果。在國際間的團結精神的感召下，成千上萬人採取了具體行動，並且走上街頭，制止大屠殺的暴行。

這迫使了過去數十年來一直支持著印尼軍方的帝國主義強權——尤其是美國——的諸政府們，和聯合國一道，對印尼軍方拉遠距離。

這個團結運動再次顯示出，公眾輿論之動員是一股力量，能把事態的進程扭轉。

我們在全球進行反不義的鬥爭中，東帝汶事件予我們最為重要的教訓就是：我們必須提出要求，創造一種具有團結聲援、民眾行動及活生生的民主的嶄新政治。

此所以我們有責任在東帝汶爭取自由的鬥爭上再接再厲。聯合國授權的勢力是不應該、也不能夠取代這項團結支援的任務。

東帝汶人民承受著物資供應短缺、缺少醫療援助和人道援助之苦楚。殺手們仍然在東帝汶活動，他們在實行堅壁清野政策，把成千上萬的東帝汶人民逐離家園，對反抗運動的戰士和領袖進行肉身消滅。「東帝汶抵抗運動國民議會」和游擊隊的力量在備受肉身消滅的同時，仍然奮力進行戰鬥。

事實上，就是為了達到維繫帝國主義國家和印尼統治階級之間的良好關係這個目的，而編排這次由印尼軍隊操縱下進行的全民投票而造成了大屠殺的後果。

第四國際要求，一切印尼勢力撤出東帝汶。聯合國授權的力量必須保證成千上萬的難民、平民返回家園——這包括那些逃往東帝汶山區和平民，及被遞解到印尼其他地區的東帝汶抵抗運動的領袖、代表，及

抵抗運動的司令古斯毛等人。

聯合國授權的力量亦必須保證，立即把由印尼軍隊撐腰的平民民兵解除武裝，並且拘捕所有民兵領袖，以使他們對他們須對之負責的大屠殺、謀殺和驅逐出境面對法律裁判。

同時，一向支持印尼政府的所有國家必須對東帝汶的重建工作、東帝汶所受到的破壞及人民所承受的困苦，予以經濟上的支持。

鑑於聯合國授權的力量長駐東帝汶將是意味到對東帝汶抵抗運動游擊隊（FALINTIL）的解除武裝，因此第四國際不能接受聯合國部隊長駐東帝汶。假如是為了尊重民眾的意願，則它必須接受「東帝汶抵抗運動國民議會」的差遣，承認東帝汶抵抗運動游擊隊為保證東帝汶領土安全的唯一合法的武裝力量。我們絕對反對強加在大多數人民身上的把東帝汶割治的任何念頭。

第四國際同樣不能接受把聯合國部隊作為維持資本主義在東帝汶內的利益之保障，例如保障資本主義在帝汶海域的石油利益——這些石油在當前被印尼和澳洲通過一項可恥的協議而備受剝削。

第四國際將繼續譴責那些繼續向印尼將領們銷售武器的死亡販子；這些死亡販子如英國的貝理雅政府之流，口裡說的是一套，做的則是另一套。

同時，我們將繼續聲援印尼國內，及印尼境內其他備受壓迫的領土之內為爭取自由民主而鬥爭的所有進步力量。

第四國際認為，以上這些俱是東帝汶這個新生國家著手展開重建過程的最低條件；第四國際站在東帝汶抵抗運動一邊，作出聲援，一如既往，繼續在一國及國際的基礎上，施展所有力量，以爭取東帝汶人民獨立成功。

當「東帝汶抵抗運動國民議會」一旦決定向全世界宣佈新國家成立的條件已經適當時，第四國際贊成全世界所有國家立即予以承認東帝汶的獨立及其臨時政府。

第四國際國際執行委員會

1999年9月

（史丹譯自《國際觀點》1999年11月月號）

革命二十年後，伊朗學生要求政治民主化

巴勒特

1979年穆斯林共和國建立二十年後，伊朗學生於1999年7月下旬走上街頭，舉行大規模反政府示威遊行。學生的要求，儘管不是明確表達出來，但主要是個人自由、言論和出版自由。目前，伊朗主要城市的街頭已恢復了平靜，但仍然不穩，學生們提出的要求，一個也沒有得到解決。新的抗議浪潮，有可能隨時爆發出來。

上街遊行和參加集會的人數，以及除學生外還有那些社會階層參與，雖然沒有精確估計，但根據國際電腦網絡顯示，街頭抗議者人流湧動，旗幟飛揚。但抗議者遭到警察和暴徒的血洗，有學生五人當場死亡，千人以上遭拘捕關禁。政府發言人發出以死罪相威脅。如果沒有國內外的反對聲音，政府的威脅很可能成為事實。

伊朗地位的重要性

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伊朗仍然是個神秘的國家，彷彿對美國人日常生活和思想歷程無多大影響。事實上，伊朗具有戰略性重要地位。伊朗以產原油著稱。原油在世界貿易中仍佔第一位。伊朗原油藏量僅次於沙特阿拉伯。此外，產油國的原油輸出，都要通過波斯灣和伊朗的霍爾木茲海峽，才能進入印度洋，然後轉運到工業發達國，伊朗正是控制著咽喉要地。裡海的近海油田已經勘探出有新的油藏量，這裡的南部海岸線是在伊朗的領地邊界之內。蘇聯解體和阿塞拜疆共和國的獨立，黑海近海新油田有可能開採。如果要從阿塞拜疆首府巴庫把原油輸出去，其費用最低廉的海運路線必須通過伊朗。因此伊朗的政治形勢及其與工業發達國的關係，是正待開發的石油市場取得成功或失敗的決定性因素。

伊朗人口6600萬，土地面積是美國的三分之二，勞動力充足，蓄有強大的軍事潛力，在中東和海灣地區，伊朗繼蘇聯解體之後是有舉足輕重之勢，中亞能否保持和平、穩定，或者陷於一片混亂，都與伊朗形勢有密切關係。

伊朗的歷史背景

早在19世紀初，伊朗曾是英俄爭奪中東的一個卒子。英、俄利用伊朗王國的軟弱無力、政治腐敗，迫使它在貿易、投資方面作出讓步，伊朗因此更加貧困，而人民的苦難加深。

俄國的1905年革命，通過阿塞拜疆把進步解放思想帶進了伊朗和土耳其。1906年，伊朗進行了立憲革命，迫使國王撕毀對英俄的讓步協議。在立憲革命中發揮最大作用的是穆斯林神職教士。伊朗穆斯林分兩派，百分之九十以上屬於什葉派，另一派叫做遜尼派。什葉派獨立於國家，從不屈服於世俗統治，這是伊朗的特有歷史背景。

1924年，陸軍上校雷扎·帕拉米·汗，在英美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並奪取了政權，他自封國王，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巴拉維國王。他切斷了與穆斯林教會的關係，使穆斯林成為他的不可調和的死敵。二次大戰期間，他背離英、美，站在德、日一邊，而英國迫使他讓位於他的兒子穆罕默德雷扎，巴拉維國王流亡南非，終其一生。

二次大戰後，伊朗發生動亂。蘇聯軍隊佔領了阿塞拜疆和庫爾德斯坦，這時伊朗首相穆罕默德·莫薩迪克執政，實行石油工業國有化，伊朗國王逃離家園，直到1953年，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下才返回伊朗，實行軍事政變，建立國王獨裁制，而首相遭監禁，親蘇的共產黨（群眾黨）被宣佈為非法黨。十年後，國王下令改革，實行所謂「白色革命」，但再過十六年，伊朗成為鎮壓民主自由人士的專制國家。然後，由什葉派教主霍梅尼聯合自由派「民族陣線」推翻巴拉維王朝。不久後，霍梅尼對自由派領袖採取鎮壓政策，或處決或流放，終於變成一個與巴拉維王朝一樣殘忍的獨裁政權。

兩伊戰後的伊朗經濟

兩伊戰後，就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而言，伊朗仍然

是不發達的國家，專靠原油輸出賺取外匯，國內貨幣貶值，除石油外，其他所有工業部門生產力下降，初看，目前的伊朗簡直是巴拉維國王統治時期的一個縮影。

在巴拉維王朝統治時，曾經有過「現代化」運動，但基礎很薄弱，只能說是虛假的「現代化」運動。汽車工業發展了，卻沒有現代化的公路，城市擴大了，例如首都德黑蘭的規模可與美國的洛杉磯相比，而城市基礎設施、環境保護卻落後遠甚。農民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他們仍然受半封建貴族的壓迫。兩伊戰爭剛結束時，經濟脫軌，困難重重，廣大農村地區回復到前資本主義時期的那種生活了。

但現在的伊朗，情況不同，年輕一代人已經進入伊朗各大學，他們除了穆斯林共和國時代的經歷外，記不得任何王朝統治的歷史了。在反伊拉克戰爭時，他們都還是很年輕的兒童，等到青少年時期，他們的國家也不再受霍梅尼這樣強有力的個人統治了。

後霍梅尼期伊朗的政治變化

民主概念和自由思想，是由「異教徒的西方」所創造的；儘管穆斯林僧侶大加反對，但伊朗人民歷來需要民主和自由。1997年，伊朗總統大選，出人意料之外，當選的總統是一名教士賽伊德·穆·卡塔米，因為他承諾要使政府自由化，允許有更大的民主權利，這就為伊朗的自由政治和社會生活開放了大門。當超越總統和政府官員權力之外的伊朗法庭，宣佈關閉薩拉日報（意為和平）時，200名學生在德黑蘭大學的阿米拉巴德姆宿舍裡舉行抗議。然後擴大為抗議集會，儘管是非暴力、非對抗性的活動，但防暴警察和狂徒們衝進校園，施放催淚瓦斯，搗毀宿舍，許多學生挨打，有些學生從窗門內被扔出去，約500名學生遭逮捕，政府當局證實有1人死亡。這便激怒了伊朗全國學生，有數千名學生上街抗議，抗議浪潮遍及各大城市、內地各省甚至裡海的南海岸。

伊朗——正處在十字路口

伊朗政府和民主派活動份子，正面臨著一個難以作出決定的選擇。自從1979年奪取政權以來的穆斯林政府也正面臨著最大的挑戰。他們作出的選擇將決定他們的命運——是繼續執政，或在不久將來被碾得

粉碎。

伊朗政府所維護的仍然是資本主義民族經濟，然而得不到歐洲、日本、北美資本家的合作。一旦「穆斯林」政府受到威脅時，外國勢力決不會伸出援手來。穆斯林政府想要繼續維持統治權，最終必須得到伊朗人民的支持。如果得不到城市貧民，特別是農村地區以及來自農村的軍隊士兵的支持，這個政府定將像伊朗王朝一樣的土崩瓦解。

伊朗學生和知識份子也同樣面臨挑戰。他們的活動範圍必須要伸向廣大人民群眾，伸向農村、伸向城市的勞動人民。伊朗廣大人民意識到穆斯林共和國的失敗，但也意識到它的成就。任何政治運動，如果不承認西方勢力對伊朗經濟和社會的滲透的危害性，則定將脫離人民。

有一個傳統的故事，題為《小黑魚》。小黑魚聽說世上還有遼闊無垠的海洋，它嚮往自由的大海洋，便克服了千辛萬苦，游向那自由的天地。但一到達目的地，已經是奄奄一息了。然而就在自由的大海洋裡，小黑魚迎來了無數的魚群，與它們團聚在一起。

伊朗人民還在走的，就是這小黑魚所走過的路程，擺在他們面前有他們前人碰到過的危險，也不知道前景如何。但正像小黑魚所發現的一樣，自由的獲得只能意味著團結一致。這就是伊朗年輕一代人所應吸取的最大教訓。

（黃申節譯自《勞工旗幟》99年9-10月號）



英國政壇再向右傾

多納特

〔貝里雅及其新工黨右翼政府在任30個月後是更趨堅實了。而反對派的保守黨則因歐盟的問題而陷入了嚴重的分裂。本文對英國的勞工界和保守派近期諸次大會的近貌作出評述〕

在1999年9月召開的「工會大會」(TUC)周年大會，是現代英國至今為止最右傾的一次大會，它標誌著新工黨對工會控制的新階段。自從20世紀初期，英國的工會運動與自由主義決裂以來，工會運動的諸領袖這一次採取了最為危險的階級合作形式：它擁護所謂的「社會夥伴制」，並且還支持新工黨政府的各種所為。這個「社會夥伴制」令工會對僱主提出的要求言聽計從，其妥協性為空前未見。

階級調和的「社會夥伴制」

新工黨不僅對工會保持距離，它並且與僱主建立一套全新的關係。在貝里雅看來，新工黨與僱主的關係，較諸其與工會的關係，是遠為重要的。貝里雅向來視工會為實現他的計劃和野心的障礙。他在9月這次「工會大會」上提出：「我們在新工黨有我們的『第三條路』，你們在你們的工會也有『第三條路』。」這所謂「第三條路」，由「工會大會」理事長蒙克斯對大會的發言表現得很清楚：「工業行動中把『他們——我們』壁壘分明的分開來的日子，業已告終。」

電機聯合工會（「工會大會」屬下一個重要的工會）的代表簡·積信（爵士）就「社會夥伴制」的說法尤為突顯，他主張「工會大會」應該放棄本身每年一度的周年大會，改而與「英國工業界大會」攜手共同召開每兩年一次的大會！

在這次周年會議上，並無哪怕一個有份量的工會領袖站出來，反對社會夥伴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早已忙於與僱主洽談保證不作罷工、保證工會利益與僱主的利益掛鉤的協議了。

在對待歐盟及單一貨幣的問題上，「工會大會」也是一意靠右，比新工黨走得還要更右。它反對新工

黨所持的「靜待時機」的立場，而主張盡快加入歐幣。英國最大型工會UNISON的立場是明確的反對歐幣，可是它的代表竟然投了棄權票。同樣，其他多個反對歐幣的工會也是不吭一聲，就此讓「工會大會」輕而易舉的取得多數，通過了「盡快加入歐幣」的議案！

「工會大會」的領袖們是為追隨歐洲大陸的社會模式，從而肯首作歐幣的後盾。可是他們並未注意到，昔日戴卓爾執政時代所推行的解除管制及私有化的政策，已經通行於歐洲大陸。在歐盟15個國家中，現時有13個是社會民主黨政府，它們正在雷厲風行地實施來自英國的模式。那麼，英國將來加入歐幣其時，還有「歐洲社會模式」的毛皮剩嗎？

來自消防員工會的左派領袖簡·加美倫，是反對「工會大會」的右傾走勢的唯一一把主要聲音。他主張各個工會與新工會斬斷聯繫，致使整個大會哄然向他圍攻。

此外，UNISON的54歲領袖提出退任該會理事長，這件事情，也突顯出軟性左派之無力反對右傾、無力反對貝里雅主義。至於強悍的左派，從他們未就「社會夥伴制」提出反對這一點來看，足見他們仍未掌握到要刻意地作出一場鬥爭的必需性。而在個別工會內部的一般左派組織，在過去一兩年間是愈趨衰弱了。

執政黨意氣風發

「工會大會」內的左派已是如此的處在劣勢，在新工黨內的左派，更是乏人聽聞的哩。

新工黨的戰略家們勝券在握，早已把兩年後的大選視為囊中物。貝里雅因此便策定其他大計，展開新的路線。貝里雅宣稱「階級戰爭」已經結束，未來是向阻礙新工黨走上「現代化」之途的「右派和左派中的保守派」開戰。

貝里雅自從把工黨憲章第四條（主張把生產資料國有化）廢除之後，他便試圖著手把20世紀初開始的

勞工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分家重新彌合。現在，他更走遠一步，號召保守黨裡支持歐盟的人士加入新工黨！貝里雅為此特別點名前執政保守黨財政大臣克拉克和副首相希士廷，希望他們蟬過別枝。自此後，他便與克拉克、希士廷組成了一個空前未有的聯線，主張在「時機適宜」時加入歐盟和歐幣——而所謂「時機適宜」，不外是指他們希望能夠就上述問題贏得全民投票的允許。

這個前所未有的聯線令保守黨的內部分歧白熱化，致令該黨在10月大會上承認，黨正處在正式分裂的邊緣。

保守黨大會上的辯論，顯示出它已斷然朝右走向——辯論的議題包括有：保衛獵狐權利（貝里雅是希望將之禁止）、保衛英鎊（以反對歐幣），乃至由戴卓爾夫人發言庇護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切，反對將他引渡出境！

貝里雅主義之勝利，令保守黨四分五裂。新工黨贏得英國政治的中間陣地，並且令素來主張奉行一個民族國的保守黨中人，感到對新工黨更覺親近。

在政壇各大派的「年會季度」結束之後，貝里雅旋即施展拳腳，更調政府人員；他在人事調動方面換上了全班子追隨他左右的人，其個人威信樹立無阻，令他在新工黨內當時得令。英國大多數新聞媒介對貝里雅的人事調動極力贊揚。在貝里雅的新政下，新工黨的全國執行局能對黨的議會團名單作出認可或否決，局面是對黨內的左派愈趨不利了。有消息說，一

些左派要員將會被剔除在下次競選名單之外；今後，新工黨的議會團名單將是對貝里雅政見唯命是從的一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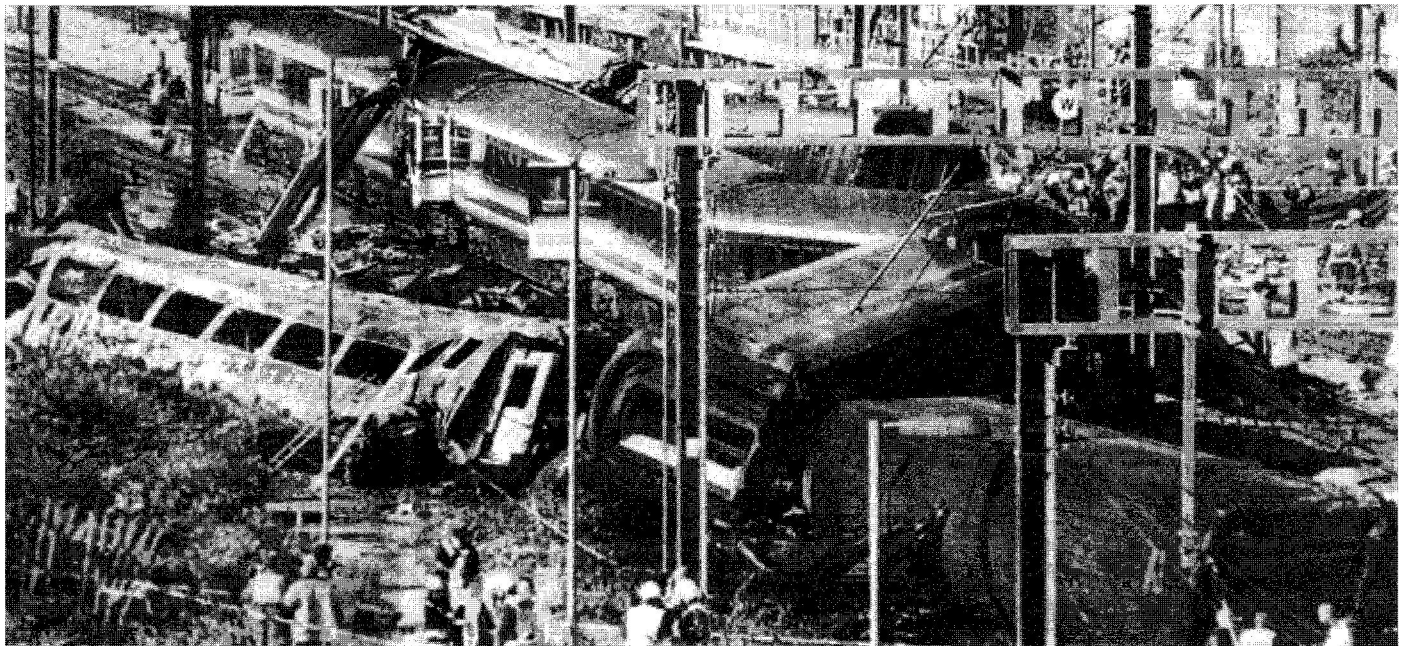
自從貝里雅對工黨大加「改革」以來，他名下最大的改革，將是在2000年時對選區實行重組。這些選區向來是左派活動的重鎮；其中，地方工會有權派遣代表出席工黨的地方管理委員會。左派將這項行之有素的制度稱為「一道活門」，以溝通黨和工會的往還。在今後，地方管理委員會將每月例會改成每三月一次例會，而委員會的決定權限也將大受限制。此外，會議將取消代表制，改而對全體會員開放。換言之，也就是取消了工黨內部的民主代議制。

在形式上，上述提議需要交到下屆周年大會上投票議決。但一般預料，這項改革將會在大會舉行之前，就以某種全民投票的形式先行通過。

貝里雅的最終用意，是希冀把工黨變為大黨，取代保守黨以成為英國資產階級的頭號政黨。他的第二個目的，是使黨內的左派，在隨著英國的罷工鬥爭經歷漫長的沉寂之後，也隨之完全在黨內無所表現。

在工黨之內，尚有一場鬥爭必須冒起。但是主要的回擊之戰，多份要來自工會或是社會運動方面；或是兩者並進。社會鬥爭的回潮或可導致工黨內的左派回復生機。不過，鬥爭的發難處不會在黨這裡。這就意味到，當務之急是強化工會內部的左派力量，及加強左派對社會運動的介入。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1999年11月號）



記英國一宗工會鬥爭

〔英國〕一名罷工工人

〔英國工運整體低沉，但工人的抗爭其實續有發生。本文用日記形式介紹英國工人及工會如何組織一次罷工行動。〕

〔1999年〕9月中：保守黨當道的溫德斯沃爾夫區議會正在制訂計劃，規定在區議會下工作的所有病假工人，須用現金「回付薪水」，或「以工代錢」來「抵償」工人因病而沒有上班的日子！工會活躍份子風聞這項計劃，頗吃了一驚。

9月22日 區議員希士達不斷接受電台及電視台訪問，透露他要用方法來制止「裝病的慣犯」。《每日郵報》有一篇文章，指責請病假的工人是「行騙」和「刮削者」。有人發起了請願信，有數百人簽名。希士達假惺惺的對請願代表說，他願意和大家達成協議，歡迎大家提出意見，會有職員作記錄。

9月23日 辦公室裡一片忿懣之聲。一個同事對我說，他在職20年來，沒有拿過什麼病假；只到今年，才因為施手術而拿了一次病假啊，可是這一次竟然被希士達議員羞辱。

9月 我們的工會UNISON收集了材料，召開一次特別會議。據資料顯示，我們這個區的職員所告的病假總數，在整個倫敦佔最低位！

10月5日 UNISON特別會議有大量人眾出席。席上，以壓倒性的大比數，投票通過立即舉行罷工投票，以決定進行一日罷工。這個結果令我們這些工會中堅份子吃驚（喜出望外是也）。大家都實在地感到，這件事令大家充滿團結精神，共同進退，必定成功的。

10月 同事們（包括有工會籍的和無參加工會的）都議論紛紛，不知道工會是否真的要來一次罷工。有個人對我說，他本來已打算退出UNISON的，因為對工會之沒有抗爭感到灰心。但他現在不會退會啦。

10月14日 舉行各工會聯席會議，有250人出席，是10年最大規模的一次會議。大家一致贊成進行罷工點票。士氣高漲。

10月中 在地區工會職員和各工會之間，就罷工點票的時間表作出無數次的討論。終於能夠爭取到我們想要的較早日期。可不過，GMB工會不會參加投票。我到各處廠房會議去，鼓吹大家投下贊成罷工之一

票。

10月22日 已經向僱主發出通知：我們快要投票了！我在早上到市政廳幾次，散發單張。人們的反應很有鼓舞性。

10月29日 點票紙已經發出。

10月30日 周六早上收到我的點票紙。我在一小時之內把點票紙填妥和寄出了。

11月初 有些會員說收不到點票紙。多數人說他們已在收到後一個星期內填寄了。

11月15日 支部秘書長不斷打電話查詢點票結果。在收回的45%點票紙，有80%人贊成罷工。真是如釋重負，興奮非常。

11月16日 UNISON舉行另一次大型會議。雖然管理層將會在11月24日的委員會會議上撤回提議，但大家的感覺是我們仍然會決定在下周某一天舉行罷工一天的。

11月17日 向僱主遞交通知書。開始著手組織糾察線及罷工當天的集會。在辦公室裡，大家為罷工的事談個不休。有一個會員，他在過去數年間只出席過一次工會的會議，現在他來問我，他該在幾點鐘往糾察線報到。

11月24日 是日罷工。在罷工前一周以來，共有127人加入了UNISON。我在早上7時30分來到糾察線——市政廳在整個早上靜悄悄的。在社會服務處和房屋處所在，糾察線的規模最大。全區10所圖書館中有9所關門停開。參與行動的會員必定有多過1000人罷，此外有更多人是在病假和年假期間。午飯集會時間上，有200人出席。UNISON地區召集人佐夫·馬丁在集會上說，要來一次整個倫敦市的行動。他的發言得到良好的反應。

11月25日 今日復工。管理層張貼告示，提供「其他選擇」。一如UNISON所料，這個「選擇」更要糟糕：提議取消年假。工會會員們現在談的是：我們在下一步採取什麼行動？

12月1日：UNISON周年大會投票決定：在聖誕節前，為再次罷工再度進行點票投票。

鬥爭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史丹譯自英國《工人自由報》1999年12月號）

美國總統選舉的首場戲

擁護資本主義的候選人辯論虛假問題和真正問題

巴勒特著 周冀甌譯

《紐約日報》的頭版說出了所有的一切：這是一張被提名為改革黨正、副總統候選人、高姿態房地產發展商唐納·特朗普（Donald Trump）和電視訪談節目主持人溫芙莉（Oprah Winfrey）的合照而已。

初步反應似乎是從好笑到討厭。而對紐約市民的一次早期民意測驗顯示，絕大多數人敦促這位「唐納」不要參加總統競選。溫芙莉倒很識趣，她馬上否認對競選副總統感興趣，不管是與特朗普或任何其他搭檔。

但是勞動人民還想要知道：為什麼有人會提議這麼一個異乎尋常的正、副總統候選人名單？為什麼政治家們和傳播媒介會這麼看低我們的智慧？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因為民主、共和兩黨都引不起人民的興趣，所以傳媒一定要想辦法把總統選舉變為一件新聞大事。

雖然初看時，這次總統競選也許正從一場馬戲退化為一場畸形人展覽，但是在統治階級內部，以及在工人階級內部，都有真正的政治問題在辯論著。在這些政治問題中，有些也許會進入總統候選人之間的辯論中，大多數是不會的。而這兩個階級所面對的基本問題，就是工人階級的憤怒，因為美國資本主義正處在其歷史上最長、最有贏利的繁榮週期中，可是工人階級卻被騙走了它的勞動成果。

對統治階級本身及對勞工運動的那些事實上替統治階級服務的所謂領導人而言，危險在於：當這個繁榮期走向終結的時候，工人們的憤怒就會無可控制地爆炸出來，而這個終結似乎即將來臨。

改革黨：資本主義競選馬戲的穿插表演

改革黨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廣大選民、特別是高薪的工人階級成員和不太滿足的小商人、專業人員的政治不滿的一個反映。它在選舉上迄今為止最大的成就，是那個浮誇的職業摔跤手文圖拉（Jesse "The Body" Ventura）在1998年之當選為明尼蘇達州州

長。他的當選只能被解釋為選民群眾叫有地位的政治精英滾蛋。

但是，文圖拉對政治常規嗤之以鼻的作法，已比改革黨創辦人佩羅特（H. Ross Perot）在任何時候的意圖，走得更遠。

改革黨是從1992年推動佩羅特競選總統的組織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佩羅特是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的一位擁有10億家財的實業家。他當時可以說是以驚恐聯邦政府負債太高這個單一問題出來競選的。他用他自己的錢購買電視時間，非常有說服力地向選民們說出失控的政府赤字所造成的威脅，以及共和黨總統（布殊）、民主黨國會之極度無法解決這個問題。誰能忘記佩羅特用來說明他的論點的彩色的圓形分析圖和活動掛圖？

佩羅特的競選活動特別有效，因為它以敬重態度對待美國人民：它沒有訴諸種族主義、性別主義的偏見或虛假的愛國主義。它不但想當然地認為我們有長於30秒的耐久集中注意力，而且認為我們懂得一點經濟和政治。在一個經濟衰退的選舉年中，佩羅特能夠得到足夠選票，使布殊不能再度當選、民主黨人克林頓當上了總統。

到了1996年，好幾個因素，包括經濟增長與低通貨膨脹的結合以及克林頓政府與共和黨議員佔多數的國會取得協議大大地削減聯邦政府在社會服務方面的支出，導致聯邦赤字得到抑制。事實上，在競選當中，克林頓能夠作出在他第二任總統期內使預算能有盈餘的允諾，一個他日後的确能夠保持的允諾。因此，當佩羅特再度在1996年參加總統選舉時，國債不再是問題了。

佩羅特於是把焦點集中在國際貿易問題上。他在1993年曾經發言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正式批准。這個協定原先是由尼克松政府與加拿大、墨西哥政府所協商的。以後的每一任總統，不管是共和黨或民主黨，都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而且為它被國會

正式批准而努力，因為它以犧牲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工人的利益為代價保證大企業擴大其利潤。它促進墨西哥邊境的maquildadora〔加工〕工業的發展，這些加工工業〔就像中國大陸靠近港、澳邊境的加工工業一樣〕，破壞了生態環境，付墨西哥工人在標準以下的工資，奪去了美國工人的工作。雖然美國的勞工運動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但是卻被它之支持克林頓弄得無能無力，倒是佩羅特挺身出來替那些反對正式批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人們講話。

由於失業人數減少、共和黨的國會多數名聲掃地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勃特·多爾）的吸引力不夠大，克林頓能夠輕易地再度當選，而佩羅特的得票總數卻大為減少。可是，他現在倒有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政黨（改革黨），及其真正的州組織和真正的地方領導層。改革黨已經變成一個比佩羅特原初的總統選舉委員會大很多的組織了。它也開始吸引想在兩黨架式之外尋找機會的政治家們了。

布坎南再次冒頭

尋求新機會的最出名的政治家是前尼克松、里根演說辭撰稿人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他在10月25日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宣佈，他不再尋求共和黨的總統提名，轉而積極爭取改革黨的提名了。

布坎南與共和黨領導層的分手，也是為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可是他是站在民族主義、孤立主義的立場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他與保守的天主教組織有密切關係，這些組織的目的是要保衛傳統的教會教義，包括教皇永無謬誤論、反對任何形式的節育以及反對授予婦女聖職。他在他最近的書上——從右方——爭辯說，美國不應該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對這個國家不是一個威脅。

布坎南在演講中時常攻擊有錢有勢的人，同情辛勤工作的窮人和「中等階級」（意即工資較高的工人）——但是他在演講中從來不攻擊老闆，也沒有從階級立場同情工人。他在政治上與1930年代的歐洲法西斯主義者——例如極受他的父親所欽佩的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的共同之處多於與真正獻身於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的戰士。

可是，即使布坎南的虛假平民主義也足以引起共和黨領導集團的憤怒，甚至它的最右翼的發言人，包括電台評論員Rush Limbaugh、專欄作家William

Safire（他本人是一位曾與布坎南密切合作過的前尼克松演講辭撰稿人）和William F. Buckley。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一位角逐人、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麥凱恩（John Mc Cain）曾公開地要布坎南離開共和黨。

不管佩羅特是否有意，他的1996年的競選活動吸引了不同意共和黨開放門戶給美國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和婦女的里根選民〔即過去支持里根的選民〕。在這些種族主義選民中，相當多的人是同意佩羅特——和布坎南——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拿較高工資的男工人（女工人不是很多）。

明顯的是，布坎南相信改革黨能夠比共和黨向他提供更好機會來推進他的政治生涯，而且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盟友——例如新同盟黨的1992年和1996年的總統候選人Lenora Fulani。這個人不但在紐約參加了改革黨，而且發言贊美布坎南，因此替後者的種族主義提供一件他所急需的左的外衣和一塊遮羞布。

改革黨之作為一個擁護資本主義的政黨，其主要目的之一，當然是要在參選時多拿選票。要達到這樣一個目的，它就要盡量避免被選民認為是一個思想「極端」的政治組織。佩羅特的大部份吸引力，特別是在1992年，是他能夠排斥思想上的信仰制度，而以一種實用主義的制度來解決這個國家所面對的問題。文圖拉的選舉成功，主要也是由於這樣一種「解決問題」的態度。為了要盡量保持改革黨的實用主義、非意識形態的政治作風，文圖拉才帶頭阻止布坎南成為改革黨的總統候選人。

文圖拉的意中人上面說過的特朗普。特朗普有足夠的錢來資助他自己的競選活動；他沒有思想上的包袱，而且他是一個出名的成功的生意人——改革黨的理想候選人。沒有人，包括文圖拉在內——他的智慧比人們期望一位前職業摔跤手所應有的智慧高得很多——期望特朗普會當選為總統；如果他阻止了布坎南取得改革黨的主導地位，他就保證了它的選舉前途。

可是，好事多磨，特朗普的第二任前妻Maria Maples最近出來威脅：如果特朗普決定競選總統，她就要「把一切事情說出來」。看樣子，將來還會有好戲可看：改革黨將會填補1980年代電視黃金時間肥皂劇如「達拉斯」、「王朝」等所留下的空隙。

共和黨：一個帳篷能有多大？

改革黨再度發現了美國資本主義政治的一個基本現實：在政治上說來，政綱對兩黨選舉制度的長期健康有害。這個害處是：如果政黨們在思想上兩極化了，那末當每個政黨輪流執政時，政府政策可能會有急劇的改變。資本家階級需要政府政策的前後一致和穩定。還有一個危險是：一個政治力量，如果其意見與兩黨中的任一政黨不一致，就會打破這兩黨的獨霸，而且會把不穩定的因素引進政治進程中來。如果能在兩大黨之中的任一黨之內盡可能容納不同的意見，資本家的政治主宰就能有更大的保障。

事實上，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它們從來都不曾忘記這樣的必要性：盡量包容在基本上不威脅資本家階級統治的那些政治力量。可是，從1955年到1975年這20年期間的政治變動，都迫使這兩大黨適應新的政治現實，適應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社會變化所帶來的政治兩極化。

南部農業的機械化，導致大多數美國黑人向南部、北部各州的城市中移居。這個社會現實，再加上新獨立的國家在非洲大陸的出現，使南部的種族隔離制度成為太大的負擔，所以美國統治階級不得不要移除對它的支持。

民主黨本來是創立種族歧視制度的政黨。但是到了1960年代，保衛種族歧視的人們則被趕出了這個政黨。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卻在共和黨中找到政治收容所，因為〔美國參議員、196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屬於共和黨保守派的〕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歡迎他們、尼克松招引他們。在那個時候，民主黨則向嶄露頭角的美國黑人政治領導人們提供機會，並且試圖把巨大的反越戰運動引入它的政治架構之中。它的最後結果就是民主共和兩黨暫時兩極化。它的例證是麥戈文（Mc Govern）成為1972年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里根成為1980-88年的共和黨總統。

到了里根總統任滿時，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之間的思想分歧的政治基礎不再存在了。

在克林頓和戈爾（Al Gore）的領導下，民主黨首先脫掉意識形態的外衣。選民們的反應非常積極。1992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布殊和1996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多爾（Robert Dole）都無法用「別選自由派！」、「別選只知道讓政府抽稅和花費的人！」等叫囂而得勝，因為選民不相信他們的

話。1998年國會中的共和黨多數雖然彈劾了克林頓，但是仍然沒有在該年的國會選舉中增多它的席位。這個失敗強烈顯示共和黨人需要擴大他們的吸引力。因此，共和黨領導人們一致同意，他們的黨需要在美國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婦女和青年等過去被尼克松和里根讓給民主黨人的選民們中，爭取支持。

共和黨領導層現在大部份是團聚在布殊總統的長子、德克薩斯州州長小布殊（George W. Bush）的周圍。他已經籌集到數以千萬美元計的款項作為他的競選經費，這個數額遠遠超過共和黨、民主黨或者其他黨的任何其他競選人所能籌措的金額。他的籌款活動的成功，已經大大地壓縮了共和黨的搏鬥場，逼使〔布殊任總統時的副總統〕奎爾（Dan Quayle）和多爾夫人（Elizabeth Dole）退出戰場。布坎南，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也可能會脫離共和黨，而走向改革黨。

福布斯

小布殊在共和黨內的主要對手是福布斯（Malcolm Stephenson "Steve" Forbes）和麥凱恩兩人。福布斯是有10億家財的出版商；麥凱恩是亞利桑那州參議員、一位曾在越南被俘的前海軍飛行員。另外三位角逐者（Alan Keyes, Gary Bauer和猶他州參議員Orrin Hatch）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不是為了他的巨大家財，《福布斯》雜誌出版王國的繼承人福布斯就不會被認真地看成為一位候選人的。在1996年，他實質上是一位單一問題的候選人，把他的整個競選建基在廢除累進所得稅、贊同一種「平等稅」的觀念上，那就是說，用同樣的百分比抽所有收入的稅。他是如此地與選民大眾脫離接觸，以致他不能了解為什麼勞動人民對他的稅務計劃有意見，因為根據他的平等稅，年收入3萬5千元的工人的稅率就與年收入3千5百萬元的高級行政人員的稅率一樣了。從小就認識福布斯的新澤西州州長惠特曼（Christine Tom Whitman，他們兩人在幼稚園中同班），就在1996年故意支持多爾提名為共和黨候選人，言外之意就是要福布斯退出競選。

小布殊

雖然布殊家族的財富沒有福布斯多，但是在許多方面，小布殊倒比福布斯更接近資本主義權力中心。

他的祖父老布殊（Prescott Bush）當過康涅狄格州參議員（小布殊即在該州出生）。他的父親布殊（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於1950年代初到德克薩斯州做石油生意，建立了一個成功的公司叫做Zapata Oil。布殊在德克薩斯州成為共和黨政治圈子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當過眾議員，在被里根選取為他的副總統競選夥伴之前擔任過中央情報局局長。1988年，布殊是自從1836年以來現任副總統當選為總統的第一個人。

在仍在爭取共和黨提名的所有候選人中，小布殊是最最代表慣常的政治的。他正在引導共和黨遠離最反動的里根派份子，而且在該黨中為美國黑人、拉丁美洲裔人和婦女打開機會。有人推測，能說流利西班牙話的小布殊（戈爾也會說流利西班牙話），也許會選擇一個拉丁美洲裔人作為他的競選夥伴。還有，根據報導，〔上面提過的新澤西州州長〕惠特曼也曾與小布殊談過副總統候選人的位置——她最近宣佈不在2000年角逐被新澤西州民主黨人Frank Lautenberg所空出的參議員席位。

可是，雖然共和黨政治領導集團對小布殊非常熱心，（捐了5千7百萬美元的競選基金以後，還在再捐），但是權力圈子以外的普通人民卻對他的競選活動提不起興趣。他們預料，2000年的選舉將會是小布殊和戈爾這兩個半斤八兩的人之間的爭鬥，因為小布殊的所謂「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這個名詞本身就是矛盾的）非常相似於克林頓和戈爾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那些對目前國家的治理滿意的人們也許高興能從常春藤聯合會名牌大學的兩位校友（小布殊，耶魯大學1970年級；戈爾，哈佛大學1970年級）之間選擇一位，但是萬萬千千的我們可不啊！

麥凱恩

統治階級的最希望能夠引起心懷不滿的美國人著迷的候選人是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麥凱恩，因為他的說話柔和的舉止和潔白的名譽掩蓋了一個憎恨勞工的反動份子。麥凱恩是一個毫不含糊地贊賞里根的人，而且在某些方面比里根更危險：因為里根在基本上只不過是替別人設計好的政策發言的一個公關而已。從他離開電影界、全職替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公關部門工作（包括主持奇異贊助的電視節目）以來，里根就知道他的任務是什麼，而且做得非常好。當其他人在幕後製訂了政策以後，里根就竭力把它推銷給電視觀眾——他認為美國工人階級只管看電視，不做別的事。

麥凱恩，在另一方面，倒是右翼政治神話的一個真正相信者，而且他並不怕交鋒。那就可能意味著戰爭。

麥凱恩雖然對克林頓的巴爾幹半島的政策採取批評的態度，但他在今年〔1999年〕的科索沃危機中，主張動用空軍和陸軍的力量對塞爾維亞發動全面進攻。麥凱恩若當上總統就會對任何罷工採取強硬手段——正像里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罷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員全部炒魷魚一樣，雖然這個工會在1980年選舉中是支持他的。

麥凱恩是一位退伍的海軍飛行員，他曾在越南河內作了五年半的戰俘。他不怕政治後果，而且敢與他自己的黨的領導層唱對台戲——例如他在競選基金的改革和煙草之作為藥物來管制等等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一般人對他的看法是，他是個誠實、勇敢的人，是競選運動經理的理想候選人。

但是，勞動人民應該看到他的動人的個性和「正直」的性格的背後：麥凱恩是工人運動的一個毫不妥協的敵人，他也很可能會使這個國家突然陷入使用地面部隊的真槍實彈的戰爭。他反對墮胎權和〔鼓勵僱用少數民族成員及婦女等的〕贊助性行動，支持布殊、克林頓政府的共和、民主兩黨均支持的貿易政策，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勞動人民應該反對他，正如他們應該反對小布殊和福布斯一樣。

民主黨：戈爾？布拉德雷？

在克林頓和戈爾擔任正、副總統期內，美國資本主義經歷了其歷史上最持久的發展時期之一。美國公司正在賺取有史以來最大的利潤。美國在世界市場上保持了首要地位，其成績遠遠超過德國和日本、它的兩個最可畏的對手。失業率是最近25年來最低的，通貨膨脹率也是停留在低水平上。聯邦政府的預算是自從1968年以來第一次得到了收支平衡。

這些經濟現實，應該使現任副總統不但可以輕易地取得黨的提名，而且可以在大選中得到勝利。但是直至1999年10月下旬，戈爾還在盡量抗爭前新澤西

州參議員布拉德雷（Bill Bradley）對他的提名的挑戰。甚至在本文正在寫作時，戈爾和布拉德雷正在達特茅斯學院舉行、由電視播放的一次「鎮選民大會」上出現，進行一次由戈爾所發起的一對一交鋒。這位副總統正在認真地看待布拉德雷的挑戰，而且在不顯得「負面」的態度下，盡量對他的發言作出尖銳的回應。

如果對美國人民而言生活是如此好的話，如果他們的生活水準比1992年高了許多的話，那末為什麼戈爾會在2000年的選舉中處於劣勢呢？如果克林頓——戈爾政府把事情管得這麼好的話，為什麼民意測驗會顯示小布殊可能會打敗任何民主黨候選人、布拉德雷真的可能使戈爾得不到提名呢？

我們很容易從同事、家庭成員和鄰居的疲倦的眼神中看出上面那些問題的答案，因為在目前這個低失業率的時期，沒有一家能有足夠的經濟收入使他們的生活過得舒舒服服，如果沒有一個以上的人去工作，如果沒有人去做超時工作的話。美國工人們天天受到命令他們購買從昂費、耗油量、四輪驅動的汽車到金剛石戒指的每樣貨物的廣告的轟擊，而數以千計的我們正像踏車上的小老鼠那樣拚命地工作，為的是要保持信用卡上的收支平衡。儘管這樣做了，我們的消費並不使我們快樂。人們只要在迪士尼世界或者大西洋城賭場觀察遊客的臉孔或者偷聽他們的會話，就會了解生活的緊張、工作的壓力對美國工人階級家庭所造成的損害。

工人們生產得更多，拿到的更少

資本主義在克林頓當政期內的增長，主要原因之一，勞動生產力增加了，但是工資沒有相應地提高。將近十年了，我們工作越來越辛苦、越來越快捷，但是我們的生活水準不比二十年前高。所以，如果我們生產得更多，但是沒有得到更多，那個額外的價值到底到哪裡去了？

給你一個暗示吧，你去看看克林頓、戈爾任期內的股票市場的走向，你就會知道了。1987年10月，歷史上最大的股票市場暴跌發生了！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了507.99點，達到1738.74點。到了1991年，在布殊總統任期內，杜瓊斯指數首次達到3,000點；到了1995年，在克林頓第一任總統任期內，杜指到達4,000點。在目前，杜指是在10,000點至

11,000點之間。

在克林頓第二任總統期內，股票價格漲了兩倍以上。股票價格是由許多複雜因素來決定——其中的許多是無理性的；可是基本上說來，它們是被公司的利潤所推動的，這些利潤在事實上是我們工作所生產的與我們的老闆所付給我們的之間的差異。而且，雖然我們工人們有工會退休金基金和菲薄的401（K）計劃，少數富有的人卻擁有公司的大股份，而且已在克林頓任下的股票上漲市場中獲取暴利。

美國工人們卻比過去任何時候工作得更辛苦，生產得更多。但是發財的不是我們工人們。

石油價格

1990年代，美國資本主義繁榮的一個被忽略的因素，是歷史地低石油價格。事實上，1999年的春天，原油（Crude Oil）價格，如果根據通貨膨脹率而調整的話，跌到了歷史上最低的階段。石油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所有貨物靠它來運輸；它是化學工業的原材料；工業化世界冬天靠它提供熱，整年靠它產生電力。石油的價格影響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貿易的任何其他商品的價格。從今年（1999年）初夏開始，因為石油輸出國組織能夠在許多年來第一次同意限制產量，因此，石油價格就在穩步上升了。自從那時以來，加油站的汽油（gasoline）價格大約漲到一加侖25分。

甚至在這個新一輪的物價上漲以前，美國工人們的儲蓄已經是任何工業化國家中最低的了，數以千計的我們，只要生一場大病，在經濟上就會破產，因為我們缺乏足夠的醫療保險。我們每個星期都把拿到的薪金用光，所以一直在祈禱，不要使家中任何人生病或受傷。

這不像「繁榮」呀！。所以，克林頓及其所期望的繼承人戈爾，就不能從這個資本主義經濟繁榮時期中得到政治利益了。說實在話，即使每個鍋子中有一隻雞，這有什麼用，如果人們累到沒有力氣去煮，而要打電話到外面去買東西來吃的話？

布拉德雷

如果不是為了這個普遍的對現實不滿，布拉德雷決不會想到要出來競選總統。他是想利用工人階級內心的不滿來推進他的政治生涯；他也想轉移勞動人民

的憤怒，使之倒回去支持民主黨。

早期的跡象顯示，他不會成功的。對戈爾不滿的勞動人民能夠很容易地去查一查布拉德雷當參議員的記錄，而且能夠發現他比戈爾好不了多少；事實上，在大多數勞工問題上，他都不比戈爾好。除了美國東北角以外，特別是在美國黑人中間，戈爾的民望比布拉德雷高很多。

勞工領導人們丟棄了責任

可是，真正使人困惑不解的，是美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之急忙地支持戈爾作為總統候選人，一點都不批評一下他之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一點都沒有承認白宮對勞動人民沒有分享到1990年代經濟繁榮的成果也許有點責任。這個原因，是不是勞聯——產聯主席斯威尼（John Sweeney）與工會底層會員沒有接觸呢？是不是勇於替工人奮鬥的那些工會官員們例如Richard Trumka、Linda Chavez-Thomson等人如此地遠離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以致認為熱心地支持戈爾為總統候選人對勞動人民有利呢？

答案是不！問題不是勞聯——產聯官員的個人的失誤。問題是他們不能超出兩黨制的政治架構，一個為了保持老闆階級的政治權力而蓄意設計的架構。他們的想法與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員的想法一樣：短見、缺乏想像力、墨守成規、保守。他們是經理人，不是工會會員所迫切需要的領導人。

因此，許多工人們指望了虛假的領導人，例如布坎南，甚至麥凱恩或小布殊。真正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引起傳媒注意的替工人說話的唯一潛在的總統候選人是對這事最不認真的人——演員、導演華倫·比提（Warren Beatty）。確實說來，比提既沒有與民主黨破裂，在工會會員或者整個工人階級中又沒有相當多的跟隨者，可是，他卻充份而坦率地發言，指出：貧窮現象——特別在婦女和孩童之間——和其他惡劣的社會現象已經達到無可饒恕的地步。這在目前這個股票價格加倍增長的時期中，應該是不可思議的。他說的，都是真話。

人民的不滿在表面之下沸騰

2000年選舉中的所有候選人，不管是用這個方法或者那個方法，一定要對就在美國社會的表面之下

沸騰的不滿，發表意見。有些候選人，例如共和黨那邊的Alan Keyes和Gary Bauer，就會試圖把爭論移轉到虛假的問題——宗教及個人道德的問題——上。其他候選人將會試圖利用它來推進他們自己的政治生涯。但是勞動人民照樣會討厭這種政治。勞動人民的這種想法，也許對「三巨頭」——戈爾（哈佛出身）、小布殊（耶魯出身）、布拉德雷（普林斯頓出身）——不利，但是，如果勞動人民留意觀察那些「政治圈外人」的話，例如麥凱恩、福布斯或者甚至布坎南，他們就會發現這些人更是工人們的危險的敵人，因為這些人企圖以對「辛苦工作的美國家庭」的虛假關心來欺騙我們。

勞動人民決不會從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得到他們所面對的問題的答案。在所有這些參加競選的候選人中，不管是民主黨、共和黨或者改革黨的候選人，沒有一位能夠充份地影響我們的生活以致我們應該支持這位候選人或者設法打敗那位候選人。根據目前的情況，即使布坎南也不能夠向我們強加一種法西斯獨裁制；反過來說，也不要指望戈爾會解決美國的經濟、種族和性別不平等的問題。誰當選，都不會有什麼分別。

與其浪費我們的時間和精力來替一位將來只會出賣我們的總統競選，我們不如集中精力在工人運動中發展出一個新的領導層，一個已從與老闆們的英勇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領導層。在目前，工人階級的新興領導人中最敏銳的，正在為建立一個工黨而努力。這個工黨是否能夠將它的範圍擴大到足以參加選舉而且得到可觀的成績，還要看將來的發展。但是，只要那個可能性存在，就需要盡量使它成為事實，以致勞動人民能夠將他們的選票投給真正代表他們、真正向他們負責的候選人，不會去選那些說是我們的「朋友」的有錢的律師或生意人。我們需要一個將會以行動來領導工人階級的領導層，不要一個在選舉完後的第二天早上就開始不見人影的領導層。

〔譯自1999年11-12月號的美國《勞工旗幟》雜誌〕



巴西南里州的重要政治勢力——工人黨

莊信

工人黨在南里奧格蘭德州（以下簡稱「南里州」）擁有45個市長，包括三個主要城市的市長，有350個以上的市參議員。1998年11月間，工人黨在全州427個市中，有組織存在的，已從320個市擴展到400個市。

工人黨是巴西人民陣線中的領導力量，人民陣線還包括左派民族主義黨、社會黨以及以前親阿爾巴尼亞的巴西共產黨。巴西議院共有55名議員；其中人民陣線佔20席，而工人黨則佔人民陣線20席中的12席。

工人黨的黨員成份主要是工人階級、鄉村貧農、教師、公務員、自由職業者以及中產階級中的下層人士，他們在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政府統治下，日益窮困化。

婦女佔工人黨黨員中的一半，但在黨的領導機關中所佔的代表名額很少。

黨的幹部基本上是屬於35歲左右的一代人，這批人在70、80年代，在反軍事獨裁的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中便參加政治生活了，那時他們還只有20歲左右；90年代以後，學生運動消沉，再也起不了先鋒作用了。

里奧格蘭德州（簡稱里州）在前新自由派政府統治下，年輕人儘管感到沒有前途，但他們中很少有人看到工人黨能為他們提供理想的方案。但這種情況在1998年選舉運動後，有所改變，因為工人黨在年輕人中再次響起了宏亮的聲音。

在1998年11月選舉運動期間及以後，大約有150個年輕人加入急進派左翼社會民主黨，這也同時反映出工人黨在年輕人中的吸引力，不但如此，年輕人還不斷地轉向黨的左翼。

里州的工人黨歷來是左翼佔優勢，但左翼在全國工人黨中卻是少數派。急進主義傳統是工人黨在里州所得成就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全國性工人黨試圖與中間偏左或中間偏右資產階級政黨建立聯盟，而里州的工人黨僅與反資產階級政黨合作。

根據南里州工人黨通訊聯絡處秘書路西沃·科斯塔的分析，由於里州工人黨勢力強大，受人信任，使該黨的全國性領導人無法干涉他們。工人黨溫和派全國領導人在地方上的支持者得不到信任，因為這批人沒有參加地方黨的各種運動。

南里州工人黨組織的迅速鞏固，表明地方黨在全國性黨內的作用越來越增強了。這種影響在當前反政府經濟政策的抗議活動中已經表現出來，並且會一直繼續到1999年11月工人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

南里州工人黨的成就與全國性黨的領導在各州的衰弱，形成了鮮明對照，原因是黨的領導層推行的是溫和政策，不能發動黨內基層去開創社會活動。

（黃申節譯自《勞工旗幟》99年7-8月號）



示威者抬着一副寫上「在卡多佐埋葬你之前，先埋葬他」的假棺木，要求中止卡多佐的經濟政策。

巴西阿雷格里港的急進左翼政府

莊信

（黃申節譯自《勞工旗幟》99年7、8月號）

巴西阿雷格里港市的市政府，是由激進左翼人士領導的，他們把人權問題與直接民主的先鋒制度結合起來。

近幾年來，該市創建了由公眾參予的預算制訂法，就是說，公民通過社區的公開會議，可以對城市政策展開爭論並加以監督。人權問題原先並不列入討論中。後來工人黨政府接受了其他組織的要求後才被列入。

市參議員海倫娜·邦修瑪說：「我們的原意並不把討論僅僅局限在建設道路和學校等問題上。我們這裡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具有創新性的。開始時，我們不知道如何討論像人權這類問題，現在我們信心加強了，便擴大了公眾參予討論的範圍，越來越多地提出非經濟方面問題。更具體地說來，就是在公眾政治演說和政府的行動中擴大人權的空間。」海倫娜是工人黨中從事人權工作、婦女工作的市參議員核心人物，她補充說：黨開始建立人權委員會時，僅成為社會上受歧視的婦女、黑人、老年人和同性戀者的聯合組織，成為接受和傳達各方面要求的中心，但還只限於集體性工作，委員會確認的問題還沒有凝聚成為一般性鬥爭。」

「人權委員會是黨向全市人權代表大會的一塊跳板。人權代表大會可分別討論每一部門的事，特別可在全體會議提出詳細討論。參加會議者可鑒定每一部門的主要要求，以及每一地區的優先考慮的問題。」

「會議參加者迫使我們把市議會轉變成為擁有權力的機關，可以監督與人權有關的政府部門。但市參議院不能指責政府或聯邦當局，因為這兩個權力機關負有憲法責任要保護人權和民權。」

「市參議院是在地區基礎上重新組織起來的，要確保各地區選民的代表性。把各部門人權工作與公眾參予預算制結合起來，我們需要的是公眾參予預算制要包括人權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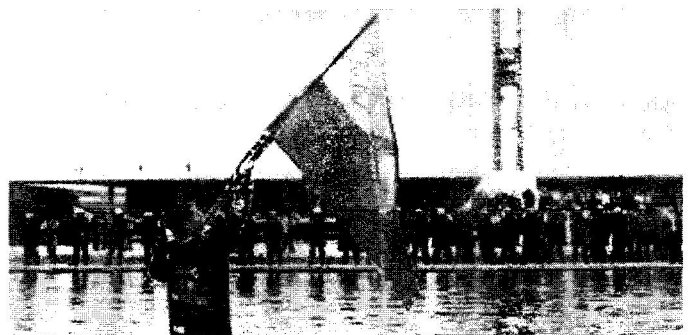
「深化直接民主是一個難以設想的經驗不斷豐富的過程，政府和工人黨的作用，是不斷地變成調解各

不同部門居民的仲裁機構，使他們集中在一起，共同找到解決方案。以街道兒童為例，他們是巴西極度貧困和社會不平等的犧牲品，但常常在他們中間出現犯罪分子。「公眾參予預算制」的成員，常常是市裡最貧窮的人，但他們是暴力的主要犧牲品。我們工人黨和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居民中間建立聯繫。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但也有不少積極的例子。譬如解決了紅燈區的妓女問題。居民們反對說，有了妓女會造成交通阻塞，噪音污染，而妓女們則說是為了求生存，我們幫助他們找到解決辦法，而毋須壓制妓女。

右翼政黨試圖利用人權來分化工人黨的廣大支持者。有一位保守派的市參議員提議要把對街道兒童的福利金轉給殘疾人。海倫娜·邦修瑪抨擊說，這種做法是有意地把勞苦居民分成應得福利金與不應得福利金的罪惡行爲。

右翼政黨企圖以市參議院來修改預算，因此攻擊公眾參予預算制的基礎。邦修瑪解釋說：「市參議院只應當落實公眾參予預算程序作出的決定，唯有社會本身才能作出兩個地區之間那一地區較為重要的決定。任何矛盾都只應通過對話來解決，而不應採取『分而治之』這種戰略政策。我們分案的本質是使每一地區，每一部門都能表達各自需要和願望，還要能理解居民中的其他各部門。」

邦修瑪最後表示：「我很高興地說，我的充份信賴人民的政策，已經證明是正確的。當我們把全部材料提供給居民使他們親自看到，感覺得到他們真正能對市政府起到監督作用，因此他們一再投票贊成團結、統一和容忍的政策」。



另一次古巴革命

厄格紐

古巴這個島有她自己的災難，這是由自然和人兩者造成的。但是這個國家最堅實的力量之一是在於它的自然資源。

古巴可以自豪的，是有大量的最高大的植物；有最細小的生存著的野生動物，像蝴蝶、蝙蝠、蜂鳥和世界上最大量的鼯鼠（一種像鼠面嘴喙特尖哺乳動物）。

在這個世紀的上半葉，社會經濟開發政策把一個貧窮的國家遺給古巴——就像她的鄰居許多拉丁美洲國家一樣。

一些有權勢的個人和外國公司控制著這個國家的財富，而文盲、貧困和缺乏醫藥服務，則使佔比例很大的人口陷於絕境。

1959年，這個島的自然資源受到嚴重的損害，當時由大量的混合農業改為蔗糖農業，遺留下來給這個國家的植被只有14%。

更進一步長期威脅古巴的生產力的，是來自習慣於使用貧瘠的耕地、污染和濫伐樹林，常常受到短期的經濟和政治效益所驅使，其結果造成開伐森林、水土流失，和不可遏制的年增長率30%的旅遊業。

在古巴，社會主義革命提出社會的需要和一黨政權改革社會的各個方面。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改革是保護環境的運動。這在拉丁美洲國家是罕見的。這就強調要引導這個國家採取長期的遠景規劃，同時強調要走向可持續的發展。

自從革命以來，植被覆蓋率只增加到17%。而現在古巴在拉美國家中森林的砍伐率是最低的，人口的增長率也最低。

這些統計資料是值得自豪和鼓舞古巴人從事保護環境鬥爭的來源。世界上的植物群有2%多一點是在古巴發現的。而且約有51%的植物群是古巴所特有的。新的種類仍待在更遠的地區有所發現。

保護資源和可證實能夠運用的成功機會，在古巴可能比西半球的其他地方要高。因為古巴已經接受可持續的發展作為政府的政策。這個政策的目標在短期和長期兩者的需要當中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柳真譯自《社會主義者行動》99年11月號）

古巴的農業成就

謝撥德

1999年10月一則來自「優質食物」的新聞宣稱，諾貝爾獎的得主已裁決給古巴一個「促進有機體革命」的小組。這個小組是「農業有機體小組」（簡稱GAO）。這個古巴有機體農業協會曾經為世界能支撐住的農業定下標準。

在接受諾貝爾獎之際，GAO主席范曼道·勞涅斯阿喬勒博士說，這個獎獎給古巴，給GAO和全體農民、研究人員和政策的製訂者，是名副其實的光榮。他們曾經在古巴為生產有機體農業工作而鬥爭。我們希望我們的努力展示給其他因襲於依賴化學農業的國家，那不是唯一的養活一個國家的辦法。

新聞透露「優質食物」的執行理事彼得·羅雪特說：「這個獎顯示目前的農業還有巨大的發展潛力，這種潛力在其他國家遠遠沒有開發出來。全世界應向古巴學習。」羅雪特博士繼續說，「在古巴，有機體是供給全體人民的，不只是給那些可以供給的人。」

我過去曾經寫過好些古巴農業開發的重要的論文，我也要描述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如何幫助在科學與自然之間協調起來，以便建立一個能支撐住的經濟和環境。

古巴的農業實踐大大不同於那些資本主義社會，為了利潤依靠化學農業日益增加使用殺蟲劑。這種殺蟲劑能產生一種使我們致癌的食物鏈。

這個獎支持那些結論。全世界的研究人員現在正在開始認識古巴在這個領域的成就。

（柳真譯自《社會主義者行動》99年11月號，此文刊於該報《要利潤還是要計劃》專欄中，題目為譯者所加。）



世界資本主義的垂死掙扎 與無產階級領導層的危機

(二)

《社會主義者行動》

斯大林主義的崩解對經濟政治的衝擊

隨著斯大林化的蘇聯的崩解，已經沒有什麼東西能抑制獨佔資本主義向世界市場的每一角落滲入，同樣理由，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礙越來越尖銳的爭奪世界市場的競爭。

沒有「冷戰」來限制資本主義的競爭與有關的政治矛盾，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利益衝突，越來越沒有節制了。還有，根據資本主義競爭的性質，資本之集中為數目越來越少、範圍越來越大的全球性的龐然大物，正在更無節制地加速。在這場經濟戰爭中的失敗者則被勝利者吞沒，後者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競爭，因而在世界市場上奪取更大的部份。

我們可以從最近幾年的加速的「合併狂」中清楚地看出，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一個資本集中、資本獨佔化的新階段。大銀行、大公司正發現無法有效地與比自己更大的競爭者競爭。所以，爲了要趕上別人，你必須超過別人。

這不是往好消息的方向走；它反映競爭尖銳化的後果，這又反過來加速、預示將來的經濟崩解。

這些徵兆中最不好的，是萬國寶通銀行與Travellers之間至今爲止最大的合併。這個合併根本是不合法的，因爲它把交易股票、債券的經紀行和其他財政機構，與持有受政府保險的存款的銀行結合起來。

上面引過的1998年4月12日《紐約時報》上的那篇文章說：「它明顯地是應被大恐慌時期通過的格拉斯——斯德爾法案禁止的，因爲當初制訂這個法案的目的，是不讓財政機構把受聯邦政府保險的銀行存款與華爾街的交易混在一起」。

換句話說，如果這個牽涉到許多許多億美元的合

併破產了的話，就像最近一些日本巨大機構所發生的一樣，大部份的損失將會由美國政府來賠償！

在此同時，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掠奪者們，根據弱肉強食的法則，你爭我奪。雖然他們都以從工人那裡剝奪來的剩餘價值爲食糧，但是，當機會來臨時，他們就以彼此爲食糧了。

但是在這個名字叫資本主義的遊戲中，工人們是十足的輸者，因爲他們所生產的越來越大部份的財富被剝奪了——一部份是在生產的時候，一部份是把稅的負擔從資本家那裡轉移到工人階級的肩膀上。

可是，那就有內在的限制。這些限制有兩個不同、但是有機地連在一起的形式：

剝削率越高，勞動力隊伍越小（兩者都是資本家們爲了降低生產成本而減少真實工資及以機器代替人力的無可避免的後果），社會上的購買力就越少。

富人雖然變得更難以置信地富有，他們只需要這麼多的房子、汽車、多重的全部服裝、多種多樣的住處等等。結果，世界市場越來越少能夠吸收越來越大量生產出來的貨物。

在這同時，利潤率也往下降，因爲，與工資相比，機器在投資了的資本中構成越來越大的部份，而機器是不產生新的交換價值——那就是剩餘價值——的。

機器和其他生產資料，只不過把「死勞動」——被活勞動混合在機器中的交換價值——轉移到被越來越少的工人們所生產的大量商品中。但是，只有活勞動才產生比資本家以工資的形式所付出的價值還要多多的價值。

換句話說，利潤不是加到生產成本上的東西，而是從活勞動所產生的價值中減掉的東西。價值超過生

產成本的這個剩餘部份，是工人們的勞動產物被資本家們所剝奪去的那個剩餘部份——較通用的名稱就是利潤。

可是，利潤率是由利潤與生產總成本——機器、廠房、原料等等以及工資——相比而得出的。因此，當利潤在總投資資本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小時，平均利潤率就下降了。

還有，因為資本家們只投資在利潤率與風險相稱〔即風險大利潤率必須高、風險小利潤率可以低些〕的地方（而所有資本主義的投資都有或多或少的風險），平均利潤率就傾向於下降到無可接受的水平。

世界資本主義需要一個仲裁人和強制執行者

美國帝國主義之決定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建立它的絕對權威，在發展的危機中扮演一個主要角色。它正在持續地擴張它的世界警察的角色。

美國統治階級，一直到最近，還以聯合國為它的「警察行動」作掩護。但是〔美國總統〕克林頓在最近以狂炸來威脅伊拉克的發言中，卻清楚地說出，從現在開始，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他們認為需要，他們就要採取行動，不用任何外衣了。

還有，美國帝國主義對古巴的長期、實際的封鎖，已因赫爾姆斯——伯滕法律的通過，成為明確的事了。所以，如果它的帝國主義夥伴（更不必說較小的世界強國）膽敢違反美國的法律，美帝就威脅要處罰它們！

攻擊伊拉克的目的也是一樣。每一次這種不受挑戰的行動，加強了華盛頓所聲稱的在任何地方採取單方面行動的「權利」，因此把它自己建立成為世界各國人民——不管是朋友或仇敵——之間的利潤爭執的最高仲裁人！

美國帝國主義的目的是雙重的。第一個而且是主要的目的，是與整個世界資本主義的利益協調一致：

所有的資本家們都了解領導的必要性。他們知道，保衛他們的世界制度的利益需要決定性的行動，所以，他們決不能讓他們對次要問題的爭吵從中作梗。因此，在資本主義的整個歷史中，當他們的階級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往往會把他們的最尖銳的分歧放在一邊。

但是，當一個像美國那樣的超級大國負起保衛利

潤制度的責任的時候，它很少把它自己的行動限制在僅僅那樣做。必然地，這個成功地把它自己建立成為最高仲裁人的國家，會利用它的權力和權威，以它的夥伴們為代價，為它自己的狹隘國家利益服務。

所以，由於以上所描述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種種問題，當已經是問題重重的全球經濟變得更壞時，美國與它的帝國主義競爭者之間的衝突一定會變得更深化。

還有，正如我們將要在本文討論墮落的工人國家的章節中看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朝向俄國邊境的擴張，不只是威脅到該國的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競爭者，而且還有更大的壞作用。

這個被美國所主宰的北大西洋軍事同盟，正使它自己處在更容易鎮壓工人暴動的位置，因為他們預料，當變了資本家的官僚們企圖毀滅十月革命所遺留的成果時，工人暴動極有可能發生。

對帝國主義及其戰爭的有效反對

里昂·托洛茨基在《過渡綱領》的標題為反對帝國主義與戰爭的鬥爭那一節中，以以下的話語為開頭：

整個世界形勢，以及由此而生的個別國家的內部政治生活，都給戰爭的威脅籠罩了。……在下一時期，一個革命政黨要想取得勝利，首先得依賴於它對戰爭問題的政策。一個正確的政策由兩個要素構成：對帝國主義及其戰爭採取不可調和的態度與能夠把黨的政綱放在群眾本身經驗的基礎上的能力。〔中譯文採用自1972年5月1日所譯的中譯本〕

這裡應該敘說一點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1939年，即是在1938年9月的第四國際成立大會通過這個《過渡綱領》之後的幾乎一年時候爆發的。

在當時，抵抗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的群眾運動，已被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對一連串的、特別是在德國、法國和西班牙的革命時機的叛賣所破壞。接著而來的戰時生產，讓世界帝國主義在法西斯和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都用當時是世界上最大量的財政赤字，來復甦它們的停滯的經濟。於是，當戰爭爆發了，數以千萬計的工人們被送上戰場互相殘殺——以

便「他們的」資本家們可以贏到超級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權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那十年（甚至在更早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在德國、法國或西班牙的勝利是大有可能的。只要在這些國家中的任何一國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就會激化、增強爭取一個社會主義世界的鬥爭，使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難以爆發，如果不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話。

接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革命的動員又在意大利、法國和希臘自動爆發了。

意大利工人階級的抗戰戰士們於1944年捕獲了企圖逃避革命正義的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將他吊死，並倒懸曝屍。他的政府沒有其他選擇，只好向它的帝國主義敵人投降。促成那個決定的一個不小的因素，是意大利敗軍的不可靠。他們需要他們以前的敵人的保護，來對付他們自己的人民。

法國的抗戰戰士們解放了早先被納粹軍隊佔領的巴黎，因此加速了德國的失敗。接著，在那以後的幾年中，法國資本主義的前途未卜。

希臘的同樣力量，在逼使法西斯佔領軍撤退之後，也在實際上控制了那個國家。

權力在這三個國家中落在群眾的手上。同時，因為大多數本土的資本家們留下來與法西斯佔領軍合作，他們在任何部份的人口中都得不到什麼支持。可是，斯大林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都與失去人民信任的資本家們組成聯合政府，來阻擋這些國家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

這些叛賣替冷戰、帝國主義向亞、非的民族解放鬥爭所發動的反革命戰爭奠定了基礎，並且加速了資本主義文明的腐蝕。

因此，正與1938年的情形一樣，戰爭問題，仍然是一個正確政策的最重要部份，而且，從那時以後，一直是世界革命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指導。

戰爭與社會主義革命

第四國際有原則地反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所有帝國主義戰爭。

與斯大林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解釋恰恰相反，我們認為，這個戰爭根本不是民主與法西斯之間的鬥

爭。

我們解釋，它是帝國主義之間為了重新瓜分、統治殖民地而起的一個鬥爭。這是世界資本主義在其腐爛時代的一個內在傾向。這個世界資本主義腐爛的時代延續到今天。

與此同時，我們站在蘇聯的一方，支持蘇聯的完全保衛性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的德國。我們也站在中國的一方，支持半殖民地中國為了自決而進行的保衛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軍隊的侵略。

這個三邊的政策——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鎮壓民族民主革命和支持爭取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構成了《過渡綱領》的心臟和靈魂：「它尤其是對於如何處理『團結群眾進行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這個中心問題，提供了一個接近的途徑、方法。」（3）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五年，美國帝國主義以聯合國為外衣，侵略朝鮮半島。美國托派不管當時的歇斯底里般的反共政治迫害，反對由美國領頭的對朝鮮半島的進侵。

然而，在當時這種反共狂的歇斯底里下，在這個國家（美國），對美國在朝鮮半島所進行的反革命戰爭，建立一個有效的反對運動，證明是幾乎不可能的。

接著在六十年代初，美國帝國主義採取行動來擊碎越南人民的自決權——包括進行革命權。這個行動，給了我們的世界運動，特別是在這個惡魔的腹地裡，非常成功地運用《過渡綱領》的方法的機會，雖然我們在這個國家中的力量是非常有限。（4）

我們終於在爭取大多數美國人民反對對越南工農的反革命戰爭上，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

我們提出「馬上撤回我們的軍隊！」為中心口號，來對抗斯大林派、自由派的「馬上談判！」的口號。它也對抗極左的口號：「讓越南革命得到勝利！」（5）

這個爭取雙方談判的「要求」，認定美國帝國主義有權談判越南人民的前途和認同斯大林派領導者的方針。

要美國人民贊同越南革命得到勝利的這個「要求」，則遠遠超過他們的意識水平，而且與他們的非常健康的反戰運動的目的衝突，因為美國群眾們不願意把他們的兒子、兄弟和丈夫送到一個否認越南群眾

有他們的基本的、民主的自決權的戰爭中去死亡。

然後，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我們在「社會主義者行動」這個組織中，以甚至更小的幹部力量，卻能夠再一次地在三藩市，動員了將近二十萬人民，反對美帝所發動、指揮的攻擊伊拉克的戰爭。

可是，美國對伊拉克所使用的這種獨一無二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使那個事件有了一個快速而且悲劇的結束。

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希，讓薩達姆·侯賽因的政府繼續掌握政權。布希知道，要移除侯賽因，就要在進攻、長期佔領整個伊拉克的過程中，犧牲無數美國人的生命。

所以，他轉而向伊拉克人民強加嚴酷的制裁，希望侯賽因會因此而對美國帝國主義對伊拉克的統治，停止任何進一步的抗拒。

那個情況並沒有發生。侯賽因在尋求保衛、推進他的資產階級的利益時，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獨立。那就是為什麼克林頓在1998年初要對伊拉克發動一次新的攻擊。

克林頓的動機不止是為了伊拉克的石油；它也是為了要建立美國帝國主義這個龐然大物在它的盟友們猶豫不決或公然反對的時候獨立行動的權利。

對於美國要對伊拉克及其人民發動另一輪的大規模毀滅這個威脅，我們又協力動員了一次反對，參加人數多到相當驚人（要知道這個動員發生在美國人的生命有任何損失之前）。

還有，國際上的反對也來自法國、俄國、中東、以及大多數的國家。法國、俄國，由於已與伊拉克作了開採、輸出其石油的交易，非常反對美國阻止它們實現利潤極高的合同的制裁。

國內、外的抗議使克林頓暫時地住手不採取行動。但他還是把他的手放在引爆器上，準備在他認為有心要爭取美國帝國主義的目的時按下去。

俄國總統葉利欽在這個危機的高潮中警告克林頓：轟炸伊拉克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個警告震驚了全世界。可是，大眾傳播媒介斥之為葉利欽的另一次失言，因為他是以作出魯莽的、使他的政治朋友們尷尬的評語出名的。

但是，這一次的葉利欽主義是有真正的實質的，雖然這個世界還看不出帝國主義之間的發展中矛盾的

深度，及其潛在的、可怕的軍事後果。

總的來說，自從1938年以來，這個世界當然變了很多。但是，就帝國主義及其戰爭而言，唯一真正地改變了的，是氫彈時代的軍事技術的破壞力。

（未完待續）

（3）這段文字是從《過渡綱領》一書的序言中引來的。

其中的引句〔用橫線劃出的〕是托洛茨基本人的話。

（4）在美國干涉越南的初期，美國托派（社會主義工人黨），有略少於一千人的黨員。

（5）這包括斯巴達同盟、其他極左的組織、以及第四國際領導層的多數。雖然我們支持越南革命，而且把這個重要問題包括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宣傳中，我們認為這個口號不符合群眾反戰意識的水平。因此，這個口號能夠動員街頭群眾的能力會比較小，因為動員街頭群眾是我們在這個惡魔的腹地中能夠幫助實現越南革命勝利的唯一方法。

見Fred Halstead所寫的優秀的反越南戰爭運動的歷史，「Out Now!」〔「現在就離開！」〕（紐約尋路人出版社）。



8折優待

·新書介紹·

歡迎郵購

書名	著者	定價
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傳)3卷集	多伊徹	\$100
斯大林評傳	托洛茨基	\$40
從蘇聯歸來	紀德	\$12
史事與回憶(3卷集)	鄭超麟	\$200

(來論)

就《「先知」引起的話題》而論

馬懷士

中央編譯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伊薩克·多伊徹的三卷本托洛茨基傳《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解除武裝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鄭異凡先生對此寫了《「先知」引起的話題》一文（下稱「鄭文」），該文在《讀書》雜誌上發表時有所刪節，我幸得全文，對「引起的話題」與鄭先生有許多不同的理解。

鄭文認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死後還沒有「公認的論定」。

其實，對托洛茨基早已有「蓋棺論定」了。斯大林在死後被揭發出的錯誤與暴行，尤其在八十年代蘇聯檔案資料公開，對斯大林也就有了公認的論定了。誠然，在中國，對托洛茨基的論定是有偏頗的（如李顯榮的《托洛茨基評傳》），但近年來也有公正的論定（如石翁、施用勤等譯《托洛茨基自傳》的《譯者前言》）。在中國對斯大林的評定有爭議。在中國早已宣稱要「維護斯大林」。（《讀書》雜誌編輯把鄭文中不利於斯大林的評述幾乎完全刪掉，就是為了「維護斯大林」。），既然定下了「維護斯大林」這個基調，也就不可能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對斯大林作出評定。既然托洛茨基、斯大林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人物，我們也就應該以國際上普遍作出的評定作為「公認的論定」了。

關於國際上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就以多伊徹的《先知》為例，鄭文已經如此引述：

「伊薩克·多伊徹在評價托洛茨基的一生時有如下一段評述：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豐富與輝煌，以至隨便拿出它的片斷都足以構成一個傑出歷史人物的故事。……如果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結束，大約與列寧同時，那麼留在人們記憶裡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領導人，紅軍的締造者和國內戰爭中的總司令，並且作為共產國際的導師，他以馬克思才有的力量與才華、以《共產黨宣言》以後人們再也未曾聽到過的語調向全世界的工人說話。他所主張的思想以及他作為

1923-1929年反對派領導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爾什維主義與共產主義編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壯一章的總結和實質。他是本世紀最大一場意識形態論戰中的主角，是工業化與計劃經濟思想的倡導者，最後，他是布爾什維克黨內抵制斯大林主義抬頭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過1927年，他也在身後留下了一份思想遺產。這份遺產，時間將賦予它越來越重要的意義，而新一代蘇聯人將根據它去摸索自己的道路。」

多伊徹對托氏的上述「論定」，是他研究所得的簡要結論，這個研究成果寫入了他的三部曲中。鄭文認定：「這個三部曲可以說是研究托洛茨基的經典性著作。由於作者能夠看到並充份利用托洛茨基帶到國外去的大量資料，還有可能訪問托洛茨基的同時代人，因此可以說直到今天這部著作仍然是不可取代的。」

對於多伊徹這三卷《先知》的國際上評價，從康慨先生寫的《吹鬍子瞪眼的老頭》一文的如下評介可以見到：

「美國最大的網上書店Amazon.com有個獨樹一幟的讀者點評功能，用來讓讀者給圖書打分。類似於給酒店評級，Amazon的讀者評分也是以星號來標記的，能評上五星級的書真可謂鳳毛麟角。但令人驚奇的是，多伊徹的這三本書無一例外地都獲得了五顆星，這可是三個滿分！這套書在西方讀者中受歡迎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詳見《中華讀書報》的《書評廣場·人物》欄）這也可反映出國際上對多伊徹關於托氏「蓋棺論定」的共識。

作者康慨本人也對托氏作了「論定」。他文內的如下一段話，更給該報編者用頗大字體加刊在該文題目之上，以顯示他們的重視：

「我們都經歷過將其視作叛徒、特務和賣國賊的漫長時代，斯大林時代的那些電影裡就充斥著對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一千人等的誣蔑和仇恨，因此對我們來說，今天一個真實的托洛

茨基更像是全新的發現。」而該文作者「像是全新的發現」的肯定評價是：托洛茨基「這位列寧最親密的戰友、紅軍的締造者，……至死捍衛著他心目中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捍衛十月革命和革命偉大的國家產物——蘇聯。他的意志至死也未動搖，也到死都讓獨裁的暴君感到恐懼。」他「有著一切傑出革命家應該具有的出眾品格和堅強意志。」他「終其一生都堅信社會主義的到來已被科學判定是不可避免的」。

鄭文也評定「托洛茨基無疑是個革命家。時到今天，可以說這句話了。」這是前進了很大一步。「托洛茨基是革命家，至今沒有發現任何可以證明他投敵或充當內奸的材料。如果這種材料確實存在的話，那麼，斯大林當年是不會輕易放過的。可以認定，他的所有材料都經過充份的梳理了，所有不利於他的資料都公佈了。」鄭文從這方面來證明托洛茨基並不是「勾結法西斯」，那是很好的。因此，應該反過來證明，斯大林捏造罪名來陷害托洛茨基是多麼罪惡。

鄭文認為：托洛茨基「堅持工業化的計劃經濟，主張在農村實行集體化。他的這些主張，在提出之初曾受到斯大林的猛烈批判，被冠之以『超工業化』、『剝奪農民』的罪名，然而在他被驅逐出國之後，斯大林馬上放手搞起全盤集體化，實行高速工業化……托洛茨基的綱領，在斯大林政權下大部分得到了實施！」「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只有程度的差別，沒有原則的區別。」「有的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

托洛茨基在1925-27年間多次提出工業化計劃，卻為斯大林、布哈林斥之為「超工業化」計劃，被蘇共第15次大會所否定。事隔兩年，1929年4月召開的蘇共第十六次代表會議通過了五年計劃，在工業化計劃中，大致採用了托洛茨基1927年工業化計劃的一些指標。1929年11月，斯大林提出全速實行農業集體化。「五年計劃」實施一年後，工業化取得顯著成績。斯大林被成績沖昏頭腦，在1930年把工業化計劃指標提高20%-30%，並且提出五年計劃四年完成，這就與托洛茨基的工業化計劃完全不同了。「真理多走一步就變成荒謬」。正如托洛茨基批判道：斯大林是「從右傾轉變為冒險主義」（《被背叛的革命》第34頁，春燕出版社出版）。托洛茨基的工業化計劃，是工業各生產部門按比例均衡發展，而斯大林的工業

化計劃，卻只側重於重工業，輕工業完全被忽視了，於是造成人民所需的生活用品甚為缺乏。為了追求實現過高的生產指標，追求產量，不顧質量，於是造成大量廢品；產品質量之差是驚人的，有些產品不合格率達到60%，甚至100%！

托洛茨基提出的農業集體化計劃是逐步進行的，而且以工業能提供農業機器為前提。農業集體化要五年、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而不是斯大林在極短時間全速實行全面的集體化。在做法上更加與斯大林不同：對富農徵收賦稅，而不是掃地出門；斯大林用刺刀把農民趕入集體農莊，而不是農民自願的建立集體農莊。托洛茨基批評道：「全部集體化的這幾年，是毀滅的命運」（同上《被背叛的革命》第39頁）。這些都是托洛茨基計劃與斯大林計劃原則上的不同，而並不是斯大林實行托洛茨基的綱領，並不是「斯大林把托洛茨基的綱領搞得如此荒唐」。斯大林實行的是斯大林的綱領，斯大林的綱領就是如此荒唐！這也就不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了。

鄭文評論「計劃經濟」時說：「計劃經濟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確定用以取代無政府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這個設想從理論上講是合理的，然而實際操作起來卻迄今沒有一個成功的示例。在20年代的爭論中，托洛茨基經常把經濟上的問題歸結為缺乏計劃所致。他沒有看到，在那種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是根本不可能有什麼計劃經濟可言的。而從30年代開始的蘇聯的計劃經濟，又充滿了領導人的唯意志論，一切計劃服從於政治的需要，制定的計劃往往朝令夕改，數字指標可以任意規定和改變。人們在計劃經濟後面看到的不是嚴密科學的計劃，而是領袖的個人意志。……但像托洛茨基那樣把整個希望都寄托在計劃經濟上，顯然是不現實的」。

托洛茨基遵照馬克思所制定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鄭文批評托洛茨基是教條主義，有大量的農業個體經濟是不能實行計劃經濟的。鄭文作者似沒了解到，托洛茨基的計劃經濟只是在國營工業（工廠、礦山、交通、運輸）、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實行計劃經濟，並不包括私營企業及農民的個體經濟。我們不能因斯大林的計劃經濟制定得不合理甚至錯誤，因而否定計劃經濟的優越性。

計劃經濟是馬克思所制定的社會主義經濟所必要

的經濟手段，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槓杆。鄭文說，實行計劃經濟沒有一個成功的示例，但已正確的指出了計劃經濟不成功的原因：「計劃經濟充滿了領導人的唯意志論，一切計劃服從於政治需要，制定的計劃往往朝令夕改。」鄭文所指的是蘇聯，而這樣的計劃經濟都是過去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的通病，當然也就沒有一個成功的示例了。

馬克思的計劃經濟不是不可實行的空想。只要在真正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上，經由全體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討論，發揮他們的創意力，根據客觀實際、具體的經濟情況、國家的財力物力，制定出「嚴密科學的計劃」，是完全可能成功的。

鄭文批評托洛茨基一套「離經叛道」的東西——不斷革命論。這是對「二次革命論」、「階段論」者的贊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是從馬克思「不斷革命」見解發展而成的。俄國革命正是實現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列寧在《十月革命四週年》一文中，闡述了俄國的不斷革命。列寧在革命後宣稱：（當年的爭論）「正確的是托洛茨基，不是我」。難道列寧是「離經叛道」嗎？而且，鄭文也明白指出：托氏的不斷革命主張「顯然不符合革命階段論的思想。然而，俄國的革命基本上就是按照這條路子走過來的。多伊徹據此稱他為『革命的先知』。」鄭文還具體指出：「看看從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歷程，二月民主革命根本就沒有能發揮（替社會主義革命創造客觀的物質前提）這種作用。在8個月裡俄國生產力不僅沒有得到發展，在戰爭的形勢下，還繼續遭到破壞，而且正因為生產力的破壞，民不聊生，才出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拯救俄國的客觀需要。從二月到十月列寧同托洛茨基的一致不是偶然的。……怪不得那時候列寧曾贊嘆說，沒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爾什維克了。」鄭文這樣的評說，也是對托氏的「論定」內容之一！

鄭文又把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批判為「教條主義」。鄭先生不能否認，世界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共產主義者不僅要首先進行民族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且要進一步推動世界革命。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是世界共產主義。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世界革命，正是以共產主義為最終目的而制定的。馬克思、恩格斯建立國際工人

協會（第一國際），就是團結各國工人階級推進世界革命運動；恩格斯建立第二國際，也是為了推進世界革命運動；列寧建立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是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的推進世界革命的事業。只當共產國際的領導權落到斯大林手上時，才把共產國際作為蘇聯的外交工具，為蘇聯的狹隘利益服務，而代替了推進世界革命的原本宗旨。

在十月革命成功後，托洛茨基和列寧同樣要推進世界革命，那裡有革命的條件，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托洛茨基和列寧都盡力推動革命的進行。沒有國際主義精神的「民族共產主義者」，才會否認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主張的正確性。

1999年8月28日



Corruption and Graft in China an Incurable Disease

Zhang Kai

Corruption and rottenness in China are the output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a disease not curable by campaigns against corruption and graft. Ever since the early 1950s, the ruling party leadership has made resolutions one after another to combat corruption, but they have all been lacking in effectiveness. With the general restoration of the profit-driven market economy, and the collusion of power and money, corruption aggravates both in scale and degree. This is evidenced again in the speech of leaders after a meeting in mid January this year.

The Bulletin of the Fourth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Disciplinary Inspection Committee of the CCP Central Leadership pointed out that this year is a crucial year in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rottenness. Party and state institutions and officials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economic, administrative, judicial and executive institutions should be centrally inspected, and illegal activitie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into and brought to justice. Among those to be put under special investigation would be the leadership of regions or departments which have suffered serious economic losses or major incidents, or where complaints from the public have been directed. The spouses and children of cadres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who have used their positions of influence should also be checked.

The above wording sounds empty and ambiguous, yet they offer a glimpse of the serious problems identified to lie with the party and state leadership. Wei Jianxing, Secretary of the Disciplinary Inspection Committee, said that in 1999, disciplinary inspection institutions all over the country investigated and closed files on over 130,000 cases, and disciplined over 132,000 party members with penalty, which included over 4,000 officials above the rank of county heads, over 300 officials above the rank of district heads, and 17 officials above the rank of provincial heads. However, if the statistics are read in a different way, it means that people below the rank of county heads numbered almost 97% among those disciplined. That means most are small flies and not big tigers.

Here are some instances reported in the media, including some major scandals.

1. The State Central Finance Depart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Monitoring Department and the Central Bank, conducted investigat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funds outside of the central budget, and uncovered that unlawful, arbitrary administrative fees and funds amounted to RMB 735 million yuan, funds for special accounts receivable by the state were 12.46 billion yuan, and receivable budgetary funds were 6.33 billion yuan. This means that besides arbitrary collection of fees, funds budgeted for special accounts and purposes were appropriated for other use, such as for foreign investments or loans.⁽¹⁾

2. The National Auditing Department found out that in 1999, various funds against financial and economic legislations amounted to 125 billion yuan. Of this, 4.3 billion yua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und was used on subsidizing administrative costs, purchase of automobiles and construction of houses. 3 billion yuan was either appropriated from the irrigation construction fund or were forced collection of funds from the people. The funds involved in the arbitrary collection of fines and fees, or secretive transfer of funds in over 2,400 law courts and 2,100 procuratorates, amounted to 5.7 billion yuan. 62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1998 were found to have arbitrarily collected fees and got involved in unapproved financial activities, with the amount totalling 4.9 billion yuan. Of the funds allocated for the migration of residents affected by the Three Gorges Dam project, 500 million yuan was appropriated for other use,

and 10 corruption cases and 14 people were prosecuted.⁽²⁾ According to a report of the APF from Beijing, the amount of Three Gorges migration fund appropriated by the officials was 5 billion yuan.⁽³⁾

3. According to Zhao Yongji, Deputy Head of the Public Security Department, economic crimes in China "hav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the amounts involved were immense". In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1999, cases investigated by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nvolved an amount of 84 billion yuan, an increase of over three times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in the preceding year. The number of cases totalled 33,000, an increase of 23% compared to the preceding year.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98, smuggled goods that were seized amounted to almost 3.7 billion yuan. At the end of 1998, in a drive against crimes in telegraphic transfers of money, China redeemed over US\$10 billion.⁽⁴⁾

4. According to a circular issued by the Disciplinary Inspection Committee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e, a particularly notorious case of smuggling in Zhanjiang City was uncovered. From early 1996 to September 1998, smuggled goods totalled a value of 11 billion yuan, tax evasion totalled 6.2 billion yuan, and 331 people were incriminated, with 259 be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including Chen Tongqing, the former party secretary of the Zhanjiang City Party Committee, and others such as the deputy city mayor, and the bureau head of the Public Security customs bureau.⁽⁵⁾

5. Yang Wenpu, an official from the Fuji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news bureau, reported that in a notorious case of smuggling investigated by the Central Disciplinary Inspection Committee, it was found that a broad network of leading government, party and bank officials were involved in the smuggling of crude oil and automobiles, and a preliminary estimate of smuggled goods imported into China via Xiamen totalled 80 billion yuan.⁽⁶⁾

6.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China Youth Daily, underground tobacco factories have extended from Fujian, Guangdong and Guangxi provinces to several other provinces in the hinterland such as Sichuan and Yunnan. Some of them take cover by using empty military camps as factories, and using special vehicles such as military trucks and post vehicles for transportation. Some processing camps are covered up by the zones being designated as prohibited military zones barring ordinary people from entry. It is reported that smuggled tobacco and fake tobacco are taking up quite a proportion in the market, and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was that the state treasury suffered a loss of 20 billion yuan a year.⁽⁷⁾

7.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Beijing Daily, in Fujian province, smuggled mobile phones totalled a value of US\$300 million, evading tax of US\$40 million. The Fujian Telecommunications Bureau has been put under investigation.⁽⁸⁾

8. Jia Chunwang, Head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made a report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December 1999, admitting that corruption, graft and abuse of power for economic interests among the public security police have been quite serious.

The above are just some incidences of corruption brought to the light. The fact that both Zhu Rongji spoke about this in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Clean Government Work Committee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and Jiang Zemin spoke about this in the Disciplinary

1 Reported by Hong Kong's Wen Hui Bao on 13 June 1999, from Beijing.

2 Special coverage by Hong Kong's Sing Tao Daily, 22 Jan 2000.

3 APF 21 Jan 2000 from Beijing, reported by Hong Kong's Shing Pao, 22 Jan 2000.

4 Special coverage by Hong Kong's Ming Pao, 11 Nov 1999.

5 Hong Kong's Wen Hui Bao, 16 September 1999.

6 Hong Kong's Ming Pao 23 Jan 2000, and Apple Daily, 21 Jan 2000.

7 Hong Kong's Oriental Daily News, 11 Jan 2000.

8 Hong Kong's Shing Pao, 22 Jan 2000.

Inspection Committee meeting, demonstrates the acuteness of the problem which does not seem to find any viable solutions. Not long ago, a decision made to increase the salary of civil servants by 30% every year for three successive years was an attempt to rescue the situation. However, the increase in salary cannot be compared to the lucrative amounts from bribery and graft.

The best answer to the state's declaration of its resolution to combat corruption and rottenness is the following. The 15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vened in September 1997 made a special pledge to combat corruption and rottenness, and called on all party cadres and all the people of China to implement it. After a year, according to Zhao Yongji quoted above, the amounts involved in economic crimes increased by over three times compared to the preceding year. The cancer continues to spread.

18 February 2000

OCTOBER REVIEW VOL.27 ISSUE 1 2000.2.29

HONG KONG

- 2 Against consumption tax..... Zhen Yan
- 3 Lin Qiaoying's illegal jailing..... Wei Bo
- 4 'My Days in Hong Kong'.....(reprint)Lin Jie

CHINA

- 6 Corruption and graft in China an incurable disease..... Zhang Kai
- 8 New partnership, old priorities..... D.McNeil
- 9 WTO deal spells misery..... P.Main

INTERNATIONAL

- 10 Mass opposition to WTO talks.....*Workers International*
- 11 Social clauses, social resistance..... D.Horman
- 16 Separatist movement destabilizes Indonesian government.....G.Foley
- 18 Indonesian women labour leader released from prison.....M.Lane
- 20 Solidarity with East Timor.....(reprint)Fourth International

- 21 Iranian students demand democracy..... T.Barrett
- 23 Britain: Labour's rightward slide..... A.Thornett
- 25 Solidarity reborn.....a Wandsworth striker
- 26 US: The opening rounds of the presidential playoffs..... T.Barrett
- 32 Brazil: Workers Party a major force in Rio Grande do Sul ... M.Johnson
- 33 Radical Left government in Porto Alegre..... M.Johnson
- 34 The other Cuban Revolution..... E.Agnoro
- 34 Cuban agricultural achievements..... R.Sheppard
- 35 Death Agony of world capitalism
and crisis of proletarian leadership(2).....*Socialist Action*

BOOK REVIEW

- 39 On reactions to *The Prophets*..... Ma Weishi

ARTICLE IN ENGLISH

- 42 Corruption and graft in China an incurable disease..... Zhang Kai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27卷 第1期 (總第199期)

2000年2月29日出版

出版人：十月書屋

編輯：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陳昌

地址：九龍旺角亞皆老街103號三樓前座

電話：9481 4926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國際電腦網絡地址：or@earthling.net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Internet E-mail Address：or@earthling.net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鯉魚涌華蘭路十四號

益新工業大廈16字樓C座

電話：2563 1068

訂閱：(本地) 每年港幣八十元

(外地) 平郵：每年US\$15.00

空郵：亞洲US\$18.00

其他US\$22.00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並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目錄

香港

- 2 反對橫徵雜稅，劫貧濟富！ 振言
3 林巧英冤獄的啓示 微波
4 我在香港的日子 （轉載）林婕

中國

- 5 與權錢結合的貪污腐敗 張開
8 舊愛、新歡 麥尼爾
9 世貿協議為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鋪路 梅茵

國際

- 10 世貿會議成為抗議戰場 史丹譯
11 世貿社會條款與社會反抗 霍爾曼
16 分離主義運動動搖印尼政府 霍理
18 印尼婦女勞工領袖訪問記 蘭尼
20 團結支持東帝汶 （轉載）第四國際國際執委會
21 革命二十年後，伊朗學生要求政治民主化 巴勒特
23 英國政壇再向右傾 多納特
25 記英國一宗工會鬥爭 [英國] 一名罷工工人
26 美國總統選舉的首場戲 巴勒特
32 巴西南里州的重要政治勢力——工人黨 莊信
33 巴西阿雷格里港的急進左翼政府 莊信
34 另一次古巴革命 厄格紐
34 古巴的農業成就 謝撥德
35 資本主義垂死掙扎與無產階級領導層危機（二）《社會主義者行動》

讀後感

- 39 就《「先知」引起的話題》而論 （來論）馬懷士

英譯

- 42 Corruption and graft in China an incurable disease Zhang Kai